臺灣師大歷史學報　第 65 期
2021 年 6 月，頁 157-214
DOI: 10.6243/BHR.202106_(65).0004

《劉福才日記》中的社會關係網絡——另一個觀看日記的視角

李宗信[*]、張育誠[**]、劉庭羽[***]

摘要

《劉福才日記》乃曾任今新社高中前身——臺中縣立新社初級農業職業學校——校長劉福才自 1917 年直到 1977 年去世為止，60 年來從未間斷的日記書寫。劉福才作為日治時代大南當地少數受過師範教育的知識分子，於日記中對於時事、地方與家族事務，均有深刻的認識與體會，主要述及劉家在新社的入墾與發跡過程、個人生命歷程、地方之歲時祭儀、生命禮俗、家族事務、參與地方事務以及對時事的關懷和感受、前往臺灣各地的遊歷、見聞等，均能藉由深刻的文字描寫、記錄其心路歷程，可說躍然於紙上且彌足珍貴。本文除了介紹《劉福才日記》外，也將嘗試藉由社會網絡分析軟體，建置日記資料庫，希望能以另一個觀看日記的視角，統整地呈現《劉福才日記》中，劉福才做為一個具體而微的地方型人物，同時也是日治時代接受國語學校教育而養成的基層教育人員，其於不同時期的社會網絡關係圖像與生命軌跡變化，同時提示一個如何整合社會網絡分析方法與地理資訊系統建置日記資料庫，進而展開跨領域研究之方法取徑。

關鍵詞：日記、資料庫、社會網絡分析、地理資訊系統

[*] 國立彰化師範大學歷史學研究所副教授兼所長
[**] 國立臺灣大學社會學系碩士
[***] 國立彰化師範大學地理學系研究所碩士

一、前言

近 20 年來，隨著政治上的解嚴與研究方法的推陳出新，利用陸續公開的日記文本展開臺灣史研究的傾向也越見普遍，特別是連續性、跨時代且長期性的日記，是提供研究者以異於官方的角度來觀看歷史的重要史料之一。[1]本人因接受行政院農委會種苗改良繁殖場委託，撰寫《細說苗圃：大南庄蔗苗養成所的故事》一書時，[2]曾前往臺中市新社區訪談退休的劉國東老師，[3]意外發現其父親——曾任臺中縣立新社初級農業職業學校（今新社高中前身）戰後首任校長的劉福才（1901-1977）——所遺留下來的日記，後經中央研究院臺灣史研究所的協助而取得日記全文，目前該日記已入藏該所檔案館。

劉福才為新社當地少數於日治時代受過師範教育的知識分子，其自幼居大南庄，並曾就讀新社公學校，畢業後考取臺北師範學校國語部，復經公學校農業專科正教員檢定及格、中等教員國語科檢定及格，並受縣市議員研究會結訓。日治時代曾任新社公學校訓導 20 年（1921-1941），在此期間劉福才亦曾受聘為東勢農林國民學校任教務 4 年（1930-1934），擔任國語（按：日語）、漢文及珠算 3 科目。此 4 年間，劉福才授與學生知識與農務，從日記文本字裡行間，皆展現其教人不倦且愉快服務的心境。而此後劉福才轉回新社公學校服務至 40 歲，便辭去教職，就任大南蔗苗養成所專事培植甘蔗工作。是年（1941）受新社庄役場聘任為庶務主任、產業課長之職贊襄庄政，直到太平洋戰爭（1941-9145）結束前後回鄉務農。戰後，劉福才接掌新社農校校長，拮据經營 6 年（1945-1951），迨民國 40 年（1951）退休後，受到鄉民、親戚鼓勵，

1 許雪姬，〈「臺灣日記研究」的回顧與展望〉，《臺灣史研究》，22：1（臺北，2015.3），頁 153-158。相關日記資料可參考中央研究院臺灣史研究所，「臺灣日記知識庫」。〈http://taco.ith.sinica.edu.tw/tdk〉（2019/2/18）。

2 李宗信撰，鍾依萍、張倚瓏、郭宏遠編輯，《細說苗圃：大南庄蔗苗養成所的故事》（臺中：行政院農業委員會種苗改良繁殖場，2018），頁 1-103。

3 劉國東乃臺中縣新社鄉大南國小美術老師退休，也是國內著名的畫家。

競選臺中縣首屆縣議員，並經高票當選，於民國40年2月14日就職。劉福才縣議員任職期滿後，最初在鄉里的支持下，原本欲再參選新社鄉鄉長，然而卻與當時執政者的理念不合而退選，從此淡出政治圈。劉福才一生致力於農業經營之研究，辛勤教學而桃李滿天下；在校園以外更是誨導地方青年發展鄉里，為新社地方頗受鄉里推崇之教育名望家。[4]

劉福才自1917年1月1日開始，直到1977年去世為止，60年間從未間斷書寫日記。雖然該日記在劉福才去世前三年，經其摘錄、翻譯而僅存五大冊，然究其內容，仍十分詳盡且精確，[5]除個人及家族事務外，對於時事與地方均有深刻認識與評述。就《劉福才日記》的結構而言，主要以追憶童年時代（1901-1916）的點滴開始，不過這個階段的內容應是其去世前整理日記時的追憶文字。除此之外，其時間斷限大致上可區分為17歲至32歲（1917-1932）、33歲至49歲（1933-1949）、50歲至64歲（1950-1964）、65歲至73歲（1965-1973）、以及74歲至77歲（1974-1977）。究其內容，除了說明劉家在新社的入墾與發跡過程、家務辦理（如分家、掃墓、移墓）、個人生命歷程及前往臺灣各地遊歷的見聞外，也述及新社當地的歲時祭儀（例如：官方的新年祝賀式、大南八幡神社例祭、始政紀念日、紀元節祝賀式、民間的農曆過年、九庄媽

4 劉福才於競選縣議員期間，曾提出「一、發展農村交通產業。二、提高教育水準。三、抑平物價。四、伸展民權。五、促進造林。六、提高公教待遇」等六項政見，或可充分反映當時的社會狀況。參見新社鄉誌編輯委員會編，《新社鄉誌》（臺中：大社會文化事業出版社，1998），頁464。

5 據家屬指出，主要是為了讓後代子孫可以用中文閱覽，而將原本六十年的日記加以刪減、摘錄成五大冊；另有一說則認為是因為家族成員有人涉入228事件，為避免惹禍上身，而刪減了日記的全文。（資料來源出自於本文於2018年參與之「第七屆日記研討會：日記中的臺灣社會」發表時，承蒙溫振華教授於與談時所提供的口訪資料。）不過，經向劉福才長子劉國東確認，劉福才是在去世前三年才開始動手整理日記，因此應與228事件無關；其次，本文將日記與外部資料進行比對發現，其於戰後所寫內容亦無因去日本化而變得仇日，對於家族問題亦毫無避諱、掩飾，故本文判斷日記內容應可能僅刪除重覆事件，而留存及翻譯的日記內容則是為了讓後代子孫方便閱讀，並非基於政治上之考量，因此日記翻譯版應僅是刪除日常重覆的記載，與原件的記載相去不遠，仍具有相當高之史料價值。

祭典演戲、中元節的送船行事、土地公福、新社太子廟、洪府王爺千秋演戲、端午節擔午時水洗青草水澡、中秋節賞月等）、生命禮俗（例如：婚禮、出生禮、喪禮）、事件（例如：馬力埔事件〔1913〕、蔗苗養成所、農業補習學校、新社婦人國語講習所）等，亦有針對時事（例如：明治天皇駕崩〔1912〕、歐戰爆發〔1939〕、裕仁太子行啟〔1923〕、皇太子御成婚〔1924〕、大正天皇駕崩〔1926〕、昭和天皇登基〔1926〕、霧社事件〔1930〕、山岡先生殉職〔1930〕、清水大震災〔1935〕、領臺四十周年紀念博覽會〔1935〕、盧溝橋事件〔1937〕、太平洋戰爭〔1941-1945〕、二二八事件〔1947〕等）發表感受或意見。相較於目前公開的臺灣相關日記，本日記的撰寫時間最長，日記主自成長、接受教育、擔任教職以迄退休的人生精華階段幾乎落在日治時代。

如許雪姬指出，目前在社會史、政治史、精神史、音樂史、婦女史與文學史中皆有應用臺灣相關日記的成果，並主張日記中展現的個人生活圈、女性觀點、文化現象及政治秘辛，皆有進一步拓展研究的可能性與必要性。[6]另一方面，黃克武評述了近代中國史上重要人物的日記研究，有四個研究取向：「傳記取向」探討日記主公私領域、「事件取向」強調日記主長期心路歷程、「記憶取向」展現從個人記憶進展到社會事件的多方競逐過程、「人際網絡取向」則研究知識界分子間的交往關係。[7]儘管日記內容所載人物並非全然都是重要人物，研究者仍能根據這些人物以及大小事件，串連成所謂的「圈」或「人際」，進而演繹出絕大多數市井小民的日常生活與真實的人際網絡。何況，劉福才身為一名地方型菁英，其日記所呈現之人際網絡與社會樣態，也可以捕捉到相關人物的觀點、視野與人際關係，加上《劉福才日記》記錄時間長達六十年，除了讓我們得以較具脈絡性地了解當代地方人物人際網絡情形外，也足以提供一套讓我們掌握與日記主出

6　許雪姬，〈「臺灣日記研究」的回顧與展望〉，頁167-169。

7　吳佩樺，〈「日記中的蔣介石」兩岸學術研討會紀要〉，《國史研究通訊》，8（臺北，2015.6），頁83。

身背景及社會階層相似的地方菁英的價值觀與思考模式。

在研究方法上，本文除了回顧社會網絡分析應用在歷史研究的成果外，也將建置「《劉福才日記》資料庫」，試圖藉由社會網絡分析（Social Network Analysis，簡稱 SNA）鳥瞰式的視角，統整地觀看並分析《劉福才日記》所登載劉福才一生的不同時期、活動空間和服務機關的生命足跡與社會網絡，希冀能藉由 SNA 進行日記研究，提示一個應用在歷史與人文研究的方法取徑。

二、社會網絡分析應用在歷史研究上的回顧

社會網絡的概念自1954年由巴恩斯（J. A. Barnes, 1918-2010）提出後，逐漸由社會學向外發展。[8]例如：1970 年代，社會網絡分析開始被應用於經濟社會學、社會心理學上的研究取向，並且發展出許多高度數學化的網絡計量模型（Network metrics）。至 1990 年代末，跨領域的社會網絡開始被大量運用，其中一部分被運用在歷史研究上（Historical Social Network Analysis，簡稱 HSNA）。[9]本文根據現有研究成果，認為 HSNA 的應用大致可以分為三個類型：即歷史人口研究、歷史結構分析及歷史文本分析。[10]以下就本文所整理的HSNA的三種類型的應用方法進行說明。

首先，「歷史人口研究」實際上與諸多當代的網絡研究並無差異，同樣都使用網絡計量模型、統計方法，僅需針對「非當代」的歷史人口資料進行分析。例如：韋瑟雷爾（Charles Wetherell）使用 19 世紀的戶口調查資料，以分屬不同農莊的戶主及其直系親屬、寄住親屬的相關數據（包括出生、死亡、移出時間、婚姻狀況等戶口資料）作為分析依據，討論歐洲在莊園制度下，平肯霍夫（Pinkenhof）人的個人親屬網絡在不同人生階段的樣貌。作者

8 J. A. Barnes, “Class and Committees in a Norwegian Island Parish,” *Human Relations*, 7:1 (February, 1954), pp. 39-58.

9 Charles Wetherell, “Historical Social Network Analysis,” *International Review of Social History*, 43: S6 (December, 1998), pp. 125-144.

10 此分類為作者經過諸多HSNA文獻的整理，自行提出三種最常見的HSNA類型。

提示 19 世紀已出現橫跨農莊與農莊之間的整體社會網絡結構（Whole Network），指出如何以歷史資料串聯現代世界所普遍認知的個人社交網絡（Ego-centered Networks）概念，並比較兩種分析方法，以一種更具意義的嶄新視野看待普通民眾的生活與重大社會變革之間的連結。[11]

其次，「歷史結構分析」運用典型社會網絡的概念分析歷史，強調微觀行動者的互動如何聚現（Emergence）鉅觀的歷史結構，為歷史解釋提供了新的取徑。傳統歷史學的史料分析容易陷於瑣碎微觀人物、事件敘事的個體化；而歷史社會學的制度論、路徑依賴等鉅觀理論，又可能造成削足適履，導致異質的個體行動者遭到忽視。在某種程度上，歷史學者與社會學者兩者對於歷史研究所持的理論觀點，分別代表了微觀陣營與鉅觀陣營的兩種立場。然而，網絡分析所展現的「聚現（Emergence）」特質，則超越這種微觀－鉅觀的爭論。聚現特質（或翻譯為「突現」）是當代社會理論在討論社會結構時的重要概念。[12]其觀點為結構的特質不能被化約成更低層級的特質；但這些更低層級的行動者匯聚一起時，會因互動而「聚現」出他們原先所沒有的特質（即往上一個層次的結構特質）。此外，亦有社會學家指出鉅觀的層次必須要由微觀的層次聚現進行研究，才算是完整的因果路徑。[13]易言之，網絡分析是一種能搭起鉅觀與微觀之間橋樑的「中層理

---

[11] Charles Wetherell, “Historical Social Network Analysis,” pp. 135-142. 其他相關研究可見 Marek Jerzy Minakowski 運用19世紀至20世紀波蘭的戶口調查資料，比較猶太裔與一般族裔的親族網絡在就學上的差別。參見 Marek Jerzy Minakowski, “Family Network of Emerging Jewish Intelligentsia (Cracow 1850-1918),” *Journal of Historical Network Research*, 2: 1 (December, 2018), pp. 53-75。整體網絡（Whole network）分析方法，係相對於個人中心網絡（Ego-centric network）分析以個人所擁有的聯繫進行研究，指的是獲取整個社會系統中參與者間的所有基本關係，重點在於攫取整體社會的本質及結構。參見Charles Wetherell, “Historical Social Network Analysis,” pp. 128-129.

[12] 萬毓澤，〈跨領域研究視野下的社會理論工作：分析社會學的觀點〉，《社會分析》，16（臺北，2018.2），頁105-174。

[13] James Coleman, *Foundations of Social Theory* (Cambridge: Belknap Press, 1990), p. 10.

論」。[14]

舉例來說，佩吉特（John F. Padgett）與安塞爾（Christopher K. Ansell）應用網絡分析，對佛羅倫斯的麥第奇家族（Medici）進行社會網絡分析，結果指出，該家族為15世紀佛羅倫斯在商業、政治、藝術三個網絡間的橋樑；個體行動者在家族聯姻、經濟往來和政治支持等方面的關係網絡，為該家族的興起及發展提出了實證的解釋。[15]此外，艾瑞克森（Emily Erikson）與比爾曼（Peter Bearman）則借助航海日記、日誌、工廠往來文件、分類帳和報告等大量數據資料，以微觀角度觀察英國東印度公司（British East India Company，簡稱EIC）船長在其追求私人利益的過程中，也同時建構並聚現出17世紀至19世紀EIC遍布全世界的多邊貿易網絡結構，這個發現顛覆了傳統歷史學者主張的由上而下的帝國政經布局。[16]

最後，「歷史文本分析」的應用雖然起步稍晚，但是其逐漸隨著數位人文、關聯式資料庫的興起而受到重視。此類應用與「文本分析」的研究相當類似，不同在於其係針對歷史資料的應用。因為數位典藏與歷史性資料庫的建立，使得研究者較容易以史料中的行動者（Agent）、知識／見聞（Knowledge）、資源（Resources）、事件（Tasks/Event）、組織（Organizations）、地點（Location）等單位進行編碼與分析。（參見「表1」）而上述的分析單位，同單位之間可以直接構成網絡，例如：透過書信，能夠建立以此往來的行動者之間的社會關係網絡。港口貿易則是以地點之間的地理特性建立鄰近網絡。除此之外，也能夠透過任意兩種不同單位，但其之間有關連的資料，構成「雙模網

---

[14] Mark Granovetter, "Economic Action and Social Structure: The Problem of Embeddedness," *American Journal of Sociology*, 91: 3 (November, 1985), pp. 481-510.

[15] John F. Padgett and Christopher K. Ansell, "Robust Action and the Rise of the Medici, 1400-1434," *American Journal of Sociology,* 98:6 (May, 1993), pp. 1259-1319.

[16] Emily Erikson and Peter Bearman, "Malfeasance and the Foundations for Global Trade: The Structure of English Trade in the East Indies, 1601-1833," *American Journal of Sociology*, 112: 1 (July, 2006), pp. 195-230.

絡」（2-mode network），例如：參與組織的成員，可推論其組織間關係或成員間關係。行動者去過的地方，能知道行動者之間或地點之間的相似性。這種不同單位所構成的「雙模網絡」，本文將在下節進一步說明。簡言之，數位文本的單位編碼化，協助研究者得以一覽文本的結構，同時提出較為客觀的分析或更具整體性的證據，而不致落入「先射箭再畫靶」的窘境。

表 1　Carley 與 Diesner 提出的文本網絡建構一覽表

項目	行動者	知識／見聞 (知識的實作)	資源	事件	組織	地點（空間有關的）
行動者	社會關係網絡	見聞網絡	能力網絡	任務網絡	成員網絡	行動者地理網絡
知識／見聞	—	資訊網絡	訓練網絡	知識需求網絡	組織見聞網絡	見聞地理網絡
資源	—	—	資源網絡	資源需求網絡	組織能力網絡	資源地理網絡
事件	—	—	—	事件位次網絡	組織任務網絡	事件地理網絡
組織	—	—	—	—	組織網絡	組織地理網絡
地點	—	—	—	—	—	（地理或空間）鄰近網絡

資料來源：Jana Diesner and Kathleen M. Carley, "Revealing Social Structure from Texts: Meta-Matrix Text Analysis as a Novel Method for Network Text Analysis." in *Causal Mapping for Research in Information Technology*, edited by V. K. Nakayama and Deborah J. Armstrong, p. 11. Hershey PA: Idea Group Pub., 2005.

由於日記基本上可視為一種非常完備的個人中心網絡素材，已有研究者建議可充分利用 19 世紀美國移民婦女所留下的日記建置個人網絡（ego network），藉以理解當時婦女的情感網絡，不過這仍然需要更多同時期的日記才足以進行統計上的分析。而且透過歷史紀錄所重建的網絡，由於受到時間與資料自身性質的限制，無法全面概括至現代的自我分析網絡方法（Ego-centered Networks），以針對各項指標所設定之分析項目。[17]是故，本文以

[17] Charles Wetherell, "Historical Social Network Analysis," p. 130.

《劉福才日記》作為網絡分析素材，主要是採取「歷史文本分析」的取徑，將日記中的行動者、事件、地點進行編碼，建構出文本中的人物關係網絡，探索整本日記的敘事結構，從而希冀能進一步發展為「歷史結構分析」的材料之一。

事實上，臺灣史學界也已注意到社會網絡分析的發展潛力。在社會網絡的概念運用方面，葉高華分析日治時期原住民部落間的親疏社會關係，進而探討日本政府如何透過集團移住「分而治之」的鉅觀政策，將位於核心的部落打散並使之與敵對部落重新組成新部落，造成舊部族關係的瓦解；其研究頗具「歷史結構分析」之特色。[18]陳百齡從位於新竹市郊法源寺寺後的一塊立於明治41年（1908）的皇恩碑出發，以《臺灣日日新報》的報導為主要素材，探究碑上留名的人物間的社會網絡關係，從而發現石碑表徵了當時新竹地方社會的三股勢力之結合。[19]曾士榮則針對《黃旺成日記》中黃氏的社會關係網絡概念，在臺灣政治文化運動的脈絡下討論其人際關係中的朋友圈如何影響黃氏國族意識的形成。[20]除此之外，臺灣研究中國近代史議題的學者中，翁稷安藉由節點計分方式的檢視討論派系關係的強度，以研究1930年代國民政府官員之《陳克文日記》——陳克文的人際關係網絡；[21]蔡旻遠則是透過書信與日記所建置之人際關係資料庫，揭示如何以胡適為網絡之中心，觀察1921-1923年間人際網絡的轉變，並以SNA作為瞭解

18 葉高華，〈分而治之：1931-1945年布農族與泛泰雅族群的社會網絡與集團移住〉，《臺灣史研究》，23：4（臺北，2016.12），頁123-172；葉高華，〈從山地到山腳：排灣族與魯凱族的社會網絡與集體遷村〉，《臺灣史研究》，24：1（臺北，2017.3），頁125-170。

19 陳百齡，〈從歷史人物到地方社會網絡：皇恩碑史料蒐集與呈現〉，《竹塹文獻》，44（新竹，2009.2），頁8-32。

20 曾士榮，〈一九二〇年代臺灣國族意識的形成：以《陳旺成日記》為中心的討論（1912～1930）〉，《臺灣文學學報》，13（臺北，2008.12），頁1-63。

21 翁稷安，〈《陳克文日記》中的人際關係及派系網絡——以1937-1938年為對象的討論〉，「第三屆『百變民國：1930年代之中國』青年學者論壇」會議論文（臺北：國立政治大學歷史學系、中國社會科學院近代史研究所民國史研究室、近代中國與東亞研究群，2018年3月2-3日），頁1-8。

中國近代知識份子的研究取徑。[22]此外，社會網絡分析相關之資料庫平臺與應用亦漸受重視，正在進行中的臺灣歷史人物傳記資料庫（Taiwan Biographical Database，簡稱TBDB），[23]及「臺灣基督徒史資料庫」，試圖從資料庫中的人物社會關係發展相關研究。[24]而在中國史領域，則有哈佛大學建置的「中國歷代人物傳記資料庫（China Biographical Database，簡稱CBDB）」，直接提供研究者得以檢視傳記人物間的社會關係的功能，如中國福建莆田於1050年至1100年間取得進士學位者的社會網路關係；[25]另外，許雅惠亦透過CBDB進行北宋晚期金石收藏者之社會關係網絡分析。[26]

綜上所述，社會網絡是歷史研究中仍待開發的一環，但 HSNA 並沒有一套制式的研究步驟與資料整理方式，要如何標準化地找出史料中節點與節點（人與人、家族與家族、部落與部落）之間的關係，就是研究者最大的挑戰。就此而言，以日記為文本存在一些優勢：其詳盡記述正好可以避免社會關係屬性難以分類的問題，也能進行長時期的觀察比較，同時透過 HSNA 利用日記文本脈絡比較外部資料、記錄涉及重大活動之結構性變化，並藉由這些變化重建市井小民的經驗加以結合。[27]其中，本文關注「圖論」（Graph Theory）與社會網絡特性，以便利用日記內容進行歷史社會網絡分析，[28]即檢視透過行動者（Actors，網絡中之節

---

22 蔡旻遠，〈「個體」與「群體」：近代中國知識分子之研究回顧與展望〉，《史原》，31（復刊10）（臺北，2019.9），頁257-299。

23 張素玢、李宗翰、李毓嵐、李昭容、顧雅文、柯皓仁、謝順宏，〈從 CBDB 到 TBDB：以《新修彰化縣志・人物志》為試金石〉，《數位典藏與數位人文》，2（臺北，2018.10），頁91-115。

24 王政文，〈臺灣基督徒史資料庫與社會網絡研究〉，《臺灣學通訊》，104（新北，2018.3），頁22-23。

25 Harvard University, Academia Sinica, and Peking University, 2018. China Biographical Database. https://projects.iq.harvard.edu/cbdb (accessed March 14, 2020).

26 許雅惠，〈北宋晚期金石收藏的社會網絡分析〉，《新史學》，29：4（臺北，2018.12），頁71-124。

27 Charles Tilly, “Retrieving European Lives,” in *Reliving the Past: The Worlds of Social History*, ed. Olivier Zunz (Chapel Hill: University of North Carolina Press, 1985), p. 31.

28 「圖論」（Graph Theory）為數學的其中一個分支，起源自柯尼斯堡七橋問題

點〔nodes〕或頂點〔vertex〕）、網絡連結關係（relational ties，網絡中之線〔edges〕或連結〔link〕）以及網絡結構（Structural Configuration）等要素形成之社會網絡。[29]易言之，透過由節點與線所構成之關係網絡，可聚焦於日記主個人的社交網絡，觀察日記文本所顯示之社會聯繫（social ties）或社會關係（social relations），以及由此構成的社會結構（social structure）。[30]透過HSNA，可關注到時間、空間、事件、網絡特性等等結構性因素的變數，了解節點間的關係網絡所產生的變化。

三、《劉福才日記》資料庫的建置

本文以單一文本，卻更具時間脈絡性的《劉福才日記》為主，藉由歷史性資料庫的建立與整理，將日記中出現的人物（行動者）、時間與地點（事件）經過編碼，以期呈現《劉福才日記》中的各種社會關係網絡。在建置資料庫之前，首先閱讀《劉福才日記》內容，掌握日記中可以分析的項目，接著進行資料整理，萃取各項目之資訊，最後蒐集外部研究與資料，進行視覺化結果分析及歷史解釋。

建置資料庫的過程中，本文關注「行動者－事件」的網絡，將其轉換成行動者之間的關係，並以此為基礎繪製為行動者之間的關係網絡圖。[31]必須說明的是，絕大多數從史料建出的網絡都是

（Seven Bridges of Königsberg），而該問題在1736年為數學家尤拉（Leonhard Euler, 1707-1738）所解決，因此尤拉被視為圖論之創始人。圖論被運用於社會網絡分析時，其目的主要在分析社會結構，以節點表示人或單位，連結則延伸為社會關係。參見張鎮華，《演算法觀點的圖論》（臺北：臺大出版中心，2017），頁3-5。

29 Stanley Wasserman and Katherine Faust, *Social Network Analysis: Methods and Applications* (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4), pp. 3-27.

30 Peter V. Marsden, “Network Data and Measurement,” *Annual Review of Sociology*, 16 (August, 1990), pp. 435-463.

31 社會網絡研究中有兩種不同形式的網絡圖，一種是由矩陣所構成，一種則是基於節點與線所組成。而節點與線的形式中，節點代表的是在該社會關係中之行動者，線則代表行動者之間的聯繫；行動者間的連結分為無向圖及有向圖網絡，無向圖表示兩者間的連結是互相傳送訊息、彼此對等的關係，有向圖則僅有一方傳送訊息，另一方沒有做出回應；本文擷取日記中人物以彼此有面對面接觸為主要

「雙模網絡」，但欲進行人物間關係的研究，則必須將「雙模網絡」轉成「單模網絡」（1-mode network）。以《劉福才日記》為例，假設日記主劉福才與人物1、2、3一起從事了A事情，或是與1、2一同經歷了B事件，與3、4同時間在同一地點C，與2、4、5同時去地點D，以上的關係就能繪製出如圖 1 上方之「雙模網絡」，其中圓圈代表人物、方塊代表事件（本文設定為時間＋地點）。接著，透過矩陣（M）相乘的運算，便能將「雙模網絡」轉換為「圖 1」下方的兩種「單模網絡」模式，「圖1」左下由線條串聯圓圈之網絡圖，表示「人與人的聯繫」，右下由線條串聯方塊之網絡圖，則是「事件與事件之間的關聯」，線條的粗細表示聯繫或關聯的強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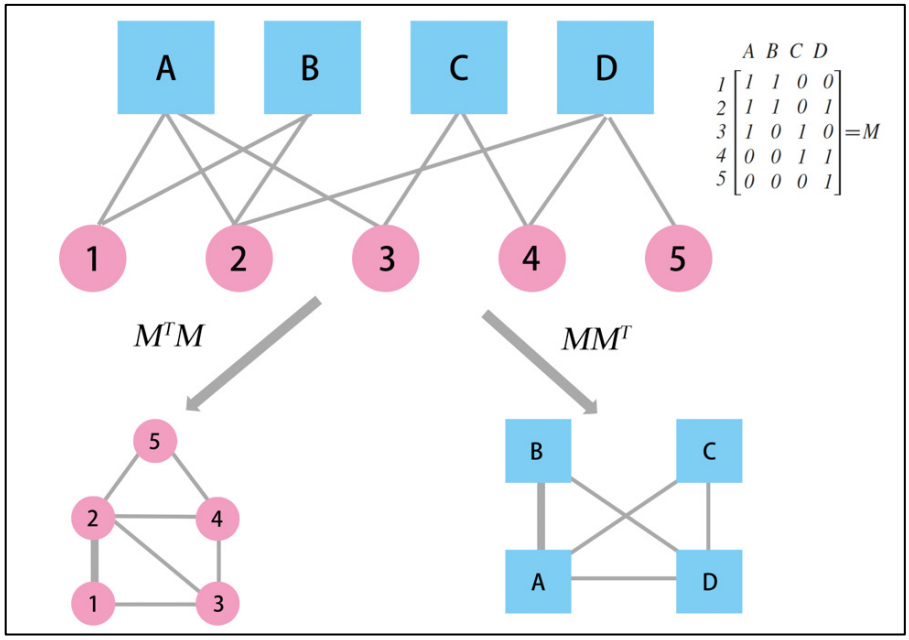

圖 1　2-mode network 與轉換示意圖

資料來源：Linton C. Freeman. "Visualizing Social Networks." *Journal of Social Structure*, 1 (February, 2000), pp. 1-15.

說明：本文繪製之圖（「圖1」、「圖3」至「圖21」）多以彩色呈現，原貌請參見《臺灣師大歷史學報》65 期全文電子檔。

依據，故採取無向圖網絡。Linton C. Freeman, "Visualizing Social Networks," *Journal of Social Structure*, 1 (February, 2000), pp. 1-15.

事實上，除非透過問卷調查直接詢問人與人的關係，否則在檔案資料中能建立「單模網絡」的資料是相當罕見的。眾所周知，甚少有史料能精準呈現「人物 1」與「人物 2」友好、「人物 1」也和「人物 3」友好（書信可能是少數的例外）。不過，史料中經常會記載人們在什麼時間、地點，共同經歷了什麼事情，或者共同參與了什麼組織，即是前述所指任意兩種不同但互有關係的單位，可建立典型的「雙模網絡」。換句話說，絕大多數從史料建出的網絡都是「雙模網絡」。但本文欲進行歷史人物關係的研究，則必須透過「雙模網絡」轉成「單模網絡」。

表 2 《劉福才日記》中時間、地點及人物關係網絡示意表

時間	地點	人物
1937.8	大坑	陳雪英_妻
1937.8	大坑	劉國禎
1937.9	大南國語講習所	陳雪英_妻
1937.9	大南國語講習所	廖冬妹
1937.9	新社	劉建勳
1937.9	新社	劉添丁
1937.9	新社	劉國禎

資料來源：本表整理自劉福才，《劉福才日記》，臺北：中央研究院臺灣史研究所檔案館藏，第2冊（1933-1949），檔案號：T1091_002。

如「陳雪英_妻」與劉國禎同時出現在大坑，「陳雪英_妻」與廖冬妹同時在國語講習所，而劉建勳（?-1964）、劉添丁（?-1975）、劉國禎（1937-?）三人同一天在新社相見。如此可整理出三組「單模網絡」，並透過上述人物與時空資訊的視覺化，形成如「圖 2」的網絡結構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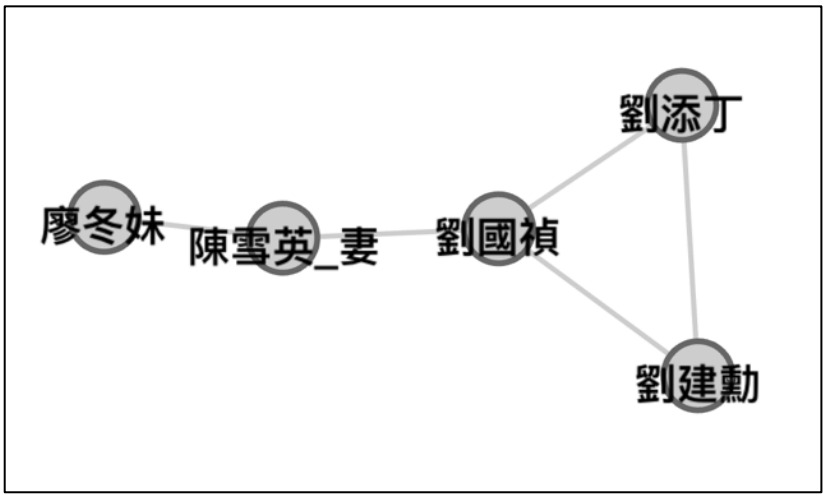

圖 2　《劉福才日記》網絡建構示範圖

資料來源：本圖依據「表 2」繪製。

為了縮短資料庫的建置時間，本文如同所有將質性史料量化的研究一般，進行了一些簡化處理。例如：日記中提及的人物超過 1,000 位，多數僅出現 1-2 次，有些彼此之間也全無關連，故資料庫刪減了幾乎沒有和別人產生聯繫的「孤鳥」與僅出現 1-2 次的「弱聯繫」（weak ties）數據，僅分析出現次數至少 3 次以上，且有與他人產生關係的行動者。由於本文並不以網絡統計運算為目的，因而刪減過於瑣碎的資料尚屬合宜。將網絡放回日記文本的脈絡檢視，也未發現此一處理有嚴重影響網絡結構的問題。[32]另在呈現人際網絡結構時，若某些時期人物數量龐大，也會為了美觀而適度精簡，例如要兩兩互動超過一定次數以上才會繪製出來，這在網絡圖中的圖例皆有說明。最後，本文之「表 2」、「圖 4」以下之人際網絡圖，以及「圖 17」劉福才一生足跡熱區圖，其資

[32] 只是，這些日記中的「孤鳥」或「弱聯繫」數據並非不重要，例如：曾經惡作劇造成劉福才的兒子劉國東墜井的鄭通，與下井救起劉國東的徐合順，就僅在落井當天的日記被提及，不過卻是劉國東每次接受訪談時一定會提起的事情。在社會網絡分析中，「弱聯繫的優勢」理論提出泛泛之交所發揮的關鍵作用，關注的是弱聯繫在日常生活發揮的超常作用。參見 Mark S. Granovetter, “The Strength of Weak Ties,” *American Journal of Sociology*, 78: 6 (May, 1973), pp. 1360-1380.

料來源皆自《劉福才日記》中擷取，圖後便不再一一詳列出處，敬請讀者諒察。

另一個必須釐清的觀念是，本文使用日記作為素材，意味著其為從日記主個人視野所觀察到的網絡關係，日記中分析出的人際關係，嚴格來說並非整體的社會關係，而是劉福才所關注的焦點、事件發生背後的邏輯結構。然而，如果所有帶有主觀意識的資料皆不能成為史料，歷史研究將無以為繼。從另一角度來看，日記應如同新聞、墓誌銘、碑文等其他體現人物關係的史料一樣，表現了社會關係的一角。除此之外，過去的網絡研究中已經證實視覺化的網絡具有「可操作性（operability）」，以特定的結構擺放成圖，甚至能詮釋出完全不同的意義。[33]是以，本文使用網絡分析工具時，在資料建構與詮釋上更為謹慎，也僅主張將視覺化的網絡分析作為研究輔助，而非試圖取代文本本身。

依照前述的步驟和方法，本文系統地整理、視覺化劉福才生命中各個階段的社會網絡關係，試著觀察誰是網絡的中心，或者網絡之間會不會出現集團或派系（通常相似的結構位置，往往會表現出相似的行動）等，藉此具體掌握不同時期網絡中行動者與劉福才之間的關係，以進一步理解日記中所述及的當地各種事件。

四、不同階段的社會關係網絡分析

對照關係的存在或型態上的不同，本文在建置資料庫的資料蒐集階段，便將這些關係劃分成 11 類，依序為：親戚、兄弟與子女、同學、師長、鄰居、同事、政府人員（職位為公部門而無法確認有其他關係者）、同事、妻子親戚（範圍為妻子娘家之姻親）、朋友、其他（非屬上述類別者，如醫生、雇用者、學生等）。有些關係是重疊的（例如：新社公學校時期的同學，後來

[33] Cathleen McGrath, Jim Blythe and David Krackhardt, “The effect of spatial arrangement on judgments and errors in interpreting graphs,” *Social Networks,* 19: 3 (August, 1997), pp. 223-242.

成為同事），此時便有賴判斷，何者對於劉福才來說更較為重要。

如前所述，這些關係是透過 HSNA 的「個人社群網絡」（personal community）模型方法所界定而出。[34]本文為提示日記史料用於社會網絡分析之方法論，以經過編排之視覺化網絡圖呈現其分析指標，然而囿於研究時間的限制故不涉及複雜的社會網絡分析指標，有待日後做進一步探討。[35]此外，在社會網絡分析架構中，最重要的是釐清行為者之間的關係特性是如何在特定結構環境中產生的，並以此觀察這些日記中出現的人際關係是如何互相影響、彼此連結的。[36]因此，依據日記文本與網絡圖所呈現之關係網絡及其結構特徵，針對劉福才在日記中與親戚、鄰居、朋友和同事等關係網絡進行人際網絡分析，並嘗試理解這些人物在該文本所提到的日常生活中，如何利用這些關係進行交流或產生互聯。總而言之，藉由網絡能觀察出劉福才網絡中具備顯著（prominent）地位的行動者，並能透過這些重要行動者之間的連結來觀察《劉福才日記》中的人際網絡結構。

因此，為使網絡圖一目了然，需要搭配相關數據的演算，進而以視覺化指標做為輔助。下文將分析在《劉福才日記》中，不同階段出現的人物所形成的社會網絡圖像。網絡圖有以下三個觀察面相：第一，以中心性（centrality）指標來界定某人物（網絡圖之節點）與他人產生聯繫的中心性程度（degree），即所謂重要程度（或依賴程度），並設定1、3、5、10、15等五個級距之圖形大小，表示其在整個網絡中的中心性程度；節點的大小越大，則其中心性越高，亦可由此判斷群聚度之高低。第二，將因同事

---

34 Charles Wetherell, “Historical Social Network Analysis,” p. 130.

35 這些分析指標的觀察面向包括：規模（size）、組成（composition）、空間離散（spatial dispersion）、互聯（interconnection）、社會支持（support）等指標，可因應各種主題分析日記資料，以進行更深入的社會網絡分析。參見 Charles Wetherell, “Historical Social Network Analysis,” pp. 131-132.

36 Stanley Wasserman and Katherine Faust, *Social Network Analysis: Methods and Applications*, pp. 3-27.

件聯繫起兩人所繪之線條，由細至粗設定數個級距，來展示該人物與他人的互動頻率程度。第三，透過該人物與劉福才的關係，藉由事件所界定人物之間的連結程度，並以此觀察不同時期劉福才在與各種關係群體之間的互動和社會網絡變化。最後，藉由網絡圖所呈現之人物與人物之間聯繫的最短路徑，判斷其接近中心性（closeness Centrality）程度；佔據中心位置之人物為該時期劉福才社會網絡之關注焦點，顯示出其所能掌握訊息、資源、權力、聲望、影響力等社會地位之情況。同時，亦可藉此關注到社會關係網絡中的弱連結優勢（strength of weak ties），以及位於弱聯繫中關鍵地位的結構洞（structural holes）理論，有助我們了解當時劉福才的信息傳遞或重要人物之社交網絡結構，以及其關係網路之變化情形，而不僅只關注強聯繫與中心性人物的重要性。

基於社會網絡分析單位源自於行動者（日記中的人物）與劉福才之間的親屬或社會關係，[37]下文依照劉福才從事的活動或服務的機關，重新劃分為 13 個時期（參見「圖 3」），同時針對不同時期的社會關係網絡圖像，著重於劉福才服務於教育機關時期進行分析與解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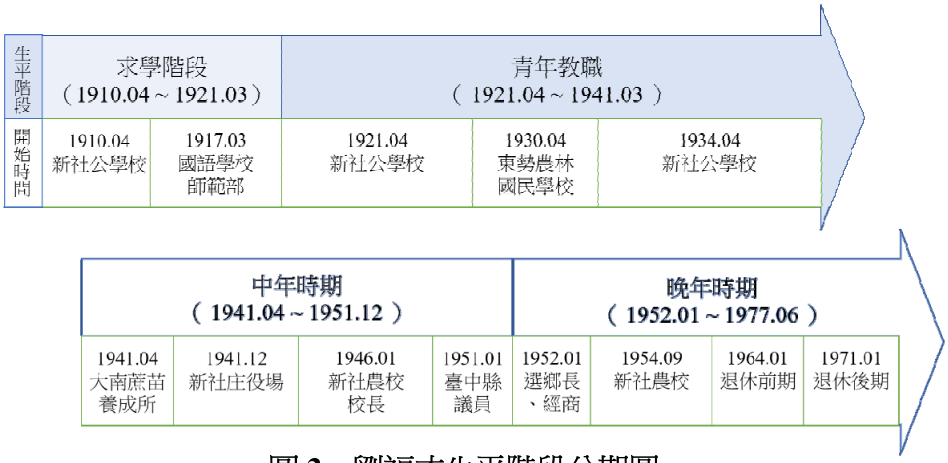

圖 3　劉福才生平階段分期圖

資料來源：劉福才，《劉福才日記》，臺北：中央研究院臺灣史研究所檔案館藏，第 1-5 冊（1917-1977），檔案號：T1091_001 至 T1091_005。

[37] Charles Wetherell, “Historical Social Network Analysis,” p. 127.

（一）求學階段：新社公學校（1910年4月至1917年3月）

劉福才就讀於新社公學校期間的事蹟，其實後來才以追憶的方式書寫而成，時間上的跳躍和空白之處較多。整體來看，相較於其他時期的網絡，此時期結構較為單純，主要以家庭和學校的生活記載為主，因此在網絡規模方面，此時期社會關係網絡的表現相當零碎化，然而仍有較為集中的網絡中心。首先就同儕網絡與師長網絡來看，透過日記可知劉福才在學期間被指派為級長，有更多機會與學校師長、同學聯繫，日記經常載及許多學校的活動。觀察「圖 4」，該時期劉福才的社會關係網絡之中心性人物以校長二之方岩次郎、大田清一（1891-1930）與叔父劉建成（?-1923）為主，劉建成因其人面與事業較廣，因此除親屬之外，亦連結了二位校長。可見親屬網絡的密集程度雖然不高，但從行動者二人之間的互動頻率程度，可知劉福才的學校與家庭生活開始出現交集的情形。就結構而言，比起一般個人社會網絡中親屬佔據網絡較大比例的情況來看，劉福才新社學校時期則以公學校網絡較為顯著，此亦反映出其在日記撰述上寫作結構之篇幅比重。由此，該時期雖然因記載較為零碎不全而使其網絡並不發達，但透過其結構性背景觀察到當時代公學校學生的人際網絡情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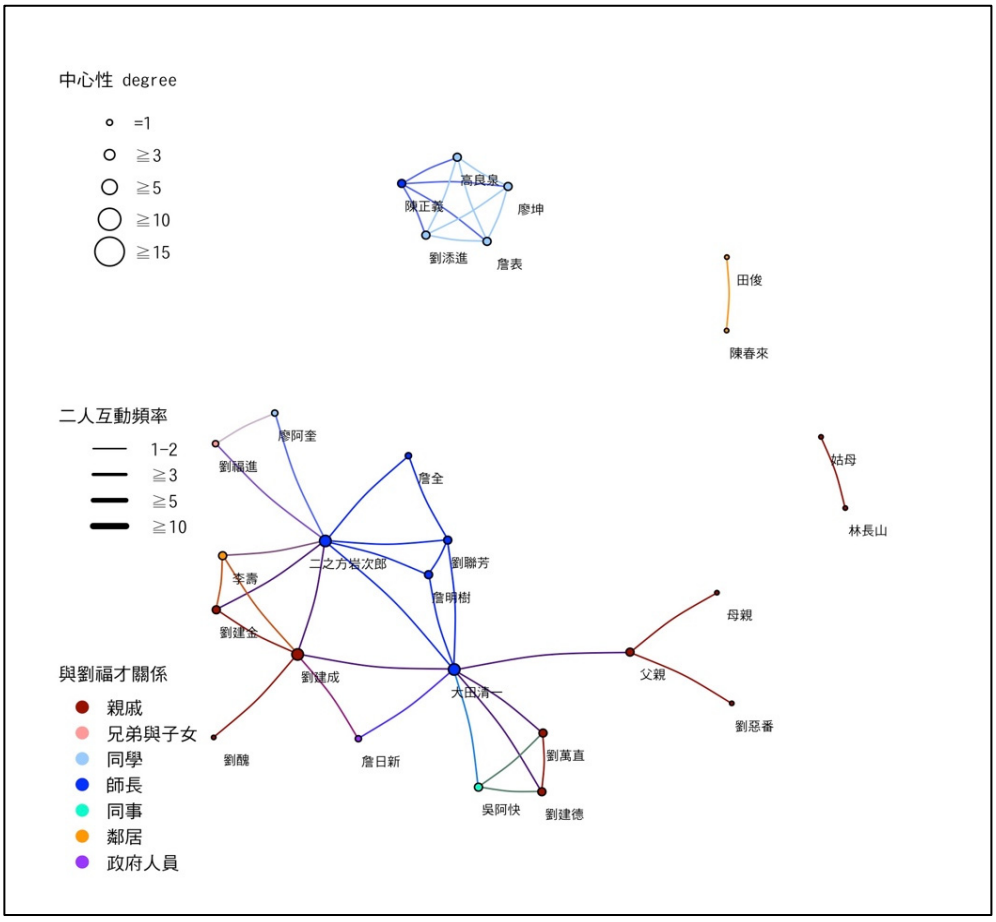

圖 4　劉福才就讀新社公學校階段之社會網絡圖

說明：

1.「吳阿快」此時其實與劉福才是同學的關係，但是就劉福才的一生而言，吳阿快後來與劉福才成為「同事」的角色關係更為重要，故圖中仍將之標記為「同事」關係。

2. 本文繪製之網絡圖（「圖4」至「圖16」、「圖18」至「圖21」）所表現之關係類別皆以色彩區分，原貌請參見《臺灣師大歷史學報》65期全文電子檔。

（二）求學階段：國語學校師範部（1917年3月至1921年3月）

大正6年（1917），劉福才進入國語學校就讀，直到大正10年（1921）畢業。而劉福才亦從此時期開始逐日記錄日常生活與心路歷程。綜觀日本殖民政府基於統治的需要所引進之近代式教育，同劉福才一樣受過初等、高等教育之下的少數社會精英，在學習近代知識、養成良好衛生及生活習慣的同時，也在這個愈發重視

學歷的社會中逐漸地形成一群近代社會領導階層。[38]許多該時期認識的同儕亦為構成此一階層中的節點人物之一。觀察「圖 5」，新社公學校時期之網絡規模，除部分親屬網絡延續至國語學校師範部時期，同學、師長的網絡規模也隨著劉福才升學而擴大，其網絡成員之組成也因此產生改變。其中，與國語學校師範部師生與新社公學校老師皆有聯繫的同鄉——詹望陸（1903-1943）——佔據劉福才同學網絡的重要地位。由於同為新社公學校校友，詹望陸因此在早期的日記文本中頻繁出現，且串連了諸多事件與師生、同學網絡。而檢視其親屬網絡與師生網絡之間，分別有幾位具相同中介度之人物聯繫了兩個網絡，即為叔父劉建成、新社公學校校長大田清一，及師範部同學劉周鳳。相對的，端看其網絡規模及其中心性人物而言，則主要以同學網絡——詹望陸——及親屬網絡——父親——為主，其分別在劉福才不同的社交圈中扮演聯繫更為緊密的中心角色。其中，詹望陸作為劉福才的同儕與同鄉，連結了其在國語學校的師生，與新社公學校校長大田清一之間的社會關係網絡。而大田校長則自轉任新社公學校開始，便成為《劉福才日記》校園記事中重要的記錄人物，其同時與劉福才的親屬以及學校網絡有緊密的聯繫。

檢視該時期的網絡結構，師生網絡比起親屬網絡的規模是更為緊密的；閱讀日記可知劉福才生活重心多著重於求學以及師生、同儕間的交往，對於家庭與親屬則多為對日常及偶發事件（如父親急病）、家庭事務的關心。而在觀察網絡圖的同時，本文注意到劉福才在國語學校所受之教育，乃臺灣總督府推動教育、教化政策和近代化人才培育的主要媒介，造就了眾多如劉福才等新式教育所培育而出的社會地方菁英。因此其在這之後所接觸之人際關係以及轉變過程，應為這一代新式地方菁英所呈現的社會關係網絡圖像。而在國語學校時期之後，劉福才不僅即將透過學校的教育提升自身的地位，進而擔負起社會教化的責任，其同時也藉由此一身分的轉換而拓展其人際關係，亦以其所受之教

[38] 許佩賢，《帝國的學校・地域的學校》（臺北：臺大出版中心，2020），頁22。

育與雙語能力，逐漸被納入學校教育與社會教育的雙層結構中。[39] 因此，對照「圖 4」、「圖 5」會發現劉福才在人際網絡的互動及依賴程度上有所提升，這個狀況亦延續至之後的青年教職時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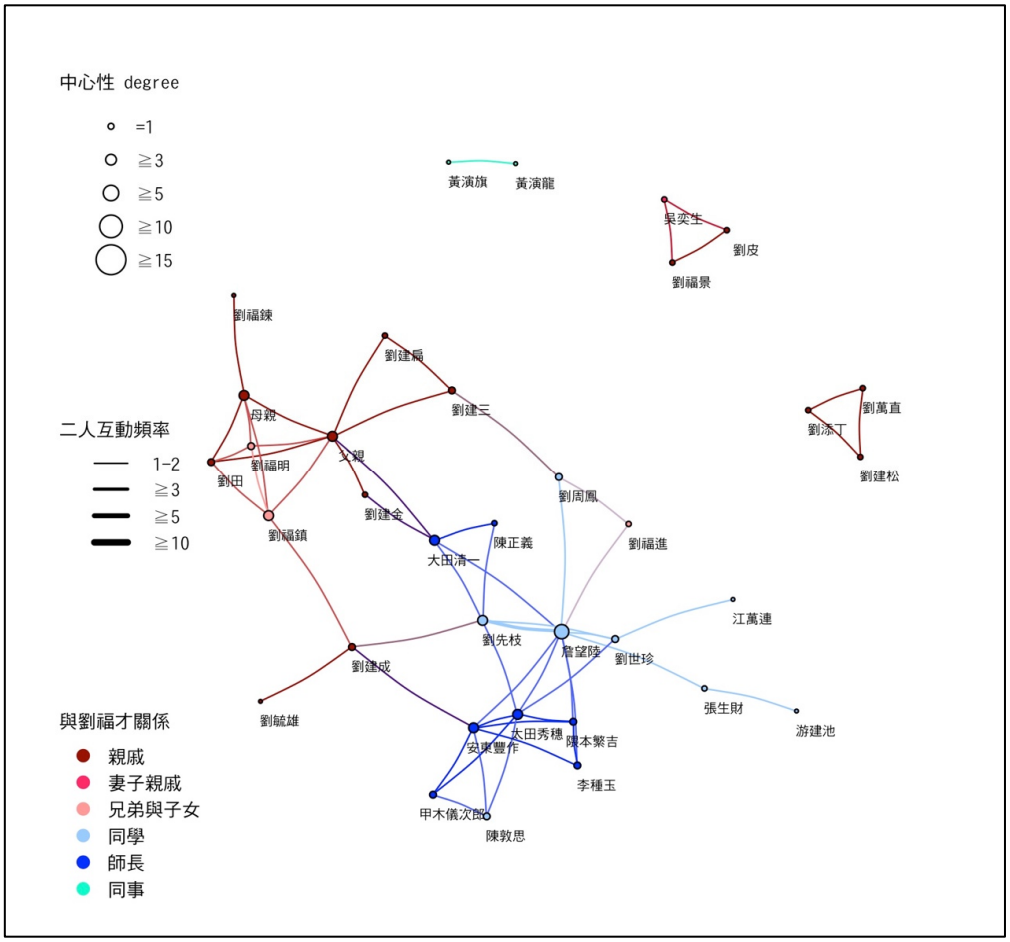

圖 5　劉福才就讀國語學校師範部時期之社會網絡圖

說明：

1.「吳奕生（?-1937）」為劉福才與妻子陳雪英（?-1970）之媒人，其在此時期的數面之緣連繫起兩人之良緣。

2.「黃演旗」為國語學校師範部時期之同學與新社公學校之同事，其與劉福才以之後「同事」的關係較為重要。

---

[39] 陳文松，《殖民統治與「青年」：臺灣總督府的「青年」教化政策》（臺北：臺大出版中心，2015），頁28-29。

（三）青年教職：新社公學校（1921年4月至1930年3月）

劉福才自國語學校師範部畢業後，依照規定回到故鄉新社從事教職，期間則在媒人的媒合下覓得了良緣，與來自大坑的陳雪英結婚，後者在劉福才一生中提供了涵蓋各方面的支持，為親屬網絡中最重要的人物。其次，身為地方型菁英，劉福才的人際網絡除了原本既有之家庭、親屬網絡，也隨著教育事業的發展，擴充教育界以及政府官員的人際網絡。如「圖6」所示，此時期出現多個網絡的中心，即妻子陳雪英、同事劉永祥、師長兼同事陳正義（1892-1972）。以陳雪英為中心之網絡，連結了劉福才親屬（含劉家親戚、妻家姻親）、兄弟與子女（劉福明〔1913-？〕、劉福進〔1905-1968〕、劉畝薈〔1923-1925〕），並與職場上同事（劉永祥）、親屬（劉金榮、羅阿生）、自師長轉變為同事者（陳正義）產生連結、互動頻繁，顯示陳雪英在劉福才網絡中具有跨網絡及強連繫特性。此外，劉福才的公學校校員身分，較之學生時期單純的師生網絡，更擴展其教育圈的人際網絡。其中，劉永祥在該時期為同事網絡之中心，不僅連接了新社公學校同事網絡（特別是陳賢宗〔1904-1952〕、羅阿生），亦與劉福才的親屬網絡有所聯繫（陳雪英、擔任保正之劉皮伯父），而為構築其強聯繫教育圈網絡的中心人物。其次，陳正義作為劉福才就讀新社公學校時期之師長，並為其任職於新社公學校時期之同事，亦在該網絡佔據重要位置。陳正義不僅為同事網絡之主要中心，亦同時連結劉福才親屬網絡（陳雪英、劉皮〔1875-1956〕、劉建成）。依其聯繫數量與中介位置，可知劉福才亦透過陳正義認識多位教育界與政府人員。另一方面，由位於教育體系領導階層的陳正義，在很大程度上亦起著帶領劉福才進入地方社會菁英階層的重要角色。而前述就學時期主要的中心性人物：詹望陸，亦成為其新社公學校之同事，其後則由於轉調他校、赴日留學（後於1943年病逝）而自網絡中逐漸消失。觀察本時期網絡結構，網絡規模明顯較前時期大，網絡組成方面亦增加了同事、政府人員，顯示由於公學校教育工作及相關人際關係的展開，擴展了其人際關係網絡範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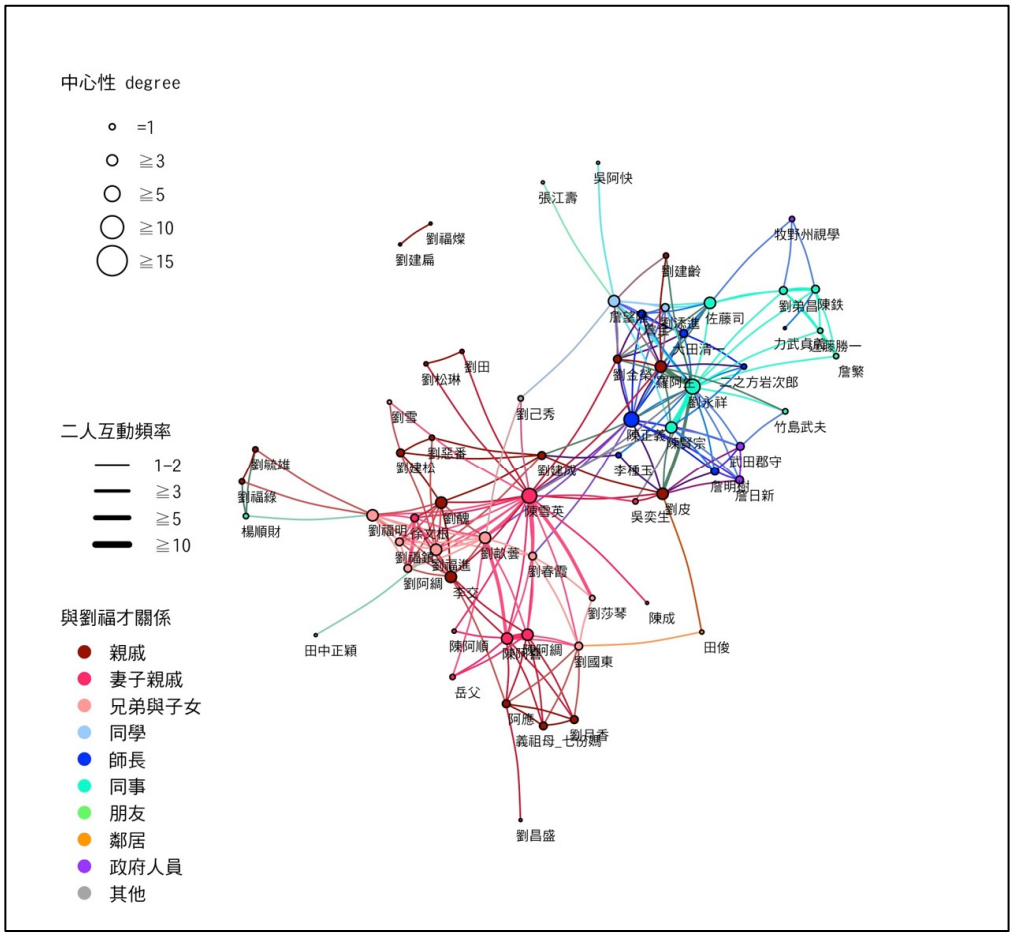

圖 6　劉福才任職新社公學校時期之社會網絡圖

（四）青年教職：東勢農林國民學校（1930年4月至1934年3月）

昭和 5 年（1930）4 月起，劉福才在他自詡為「三十而立」的年紀時，轉調到東勢農林國民學校服務。[40]觀察「圖 7」，主要為兩個分離的網絡、三個中心人物。其一為以妻子陳雪英與鄭萬安（?-

[40] 劉福才任職之東勢農林國民學校全名為臺中州東勢農林國民學校，該校於 1929 年自新社公學校獨立，為隸屬於東勢街二庄組合下農會附屬之農業補習學校。該校於 1934 年改為公立學校，改名為臺中州州立東勢農林國民學校。參見臺灣總督府編，《臺灣總督府及所屬官署職員錄．昭和四年》（臺北：臺灣時報發行所，1929），頁 385；臺灣總督府編，《臺灣總督府及所屬官署職員錄．昭和九年》（臺北：臺灣時報發行所，1934），頁 420。

1939）為主的親屬、近鄰關係網絡。尤其，陳雪英成為親屬網絡中的中心節點，進而與劉福才友人鄭萬安產生聯繫，而為此時期掌握劉福才整體社會網絡的中介中心人物。鄭萬安為劉福才友人與鄰居，在該時期網絡中連結多個劉福才親屬，並在劉福才分家時幫忙傳遞親屬之間的消息，也因此建立起由傳遞資訊為中心所形成之劉福才親友社會網絡。其二，以東勢農林國民學校為主之同事網絡，則以近藤勝一校長（兼任新社公學校校長）為中心，不過與劉福才親屬網絡基本上沒有其他連結，該網絡中僅三井康臣（原為學年主任，後升任東勢農林國民學校校長）與陳雪英連結到同事與親屬網絡，主要是因為這兩人同時被寫在日記的同一天與地點，事實上兩者並未有真正的聯繫，因此在網絡圖中形成僅有一條聯繫的弱連結關係。

而與前期比較，東勢農林國民學校的學校網絡大幅縮減，形成節點之間聯繫頻率大致均衡的網絡型態，而僅有近藤校長為其網絡主要中心人物，可見劉福才在本時期的日記寫作大多著墨於家庭事務，其次才為校園事務；而由於時間段較任職新社公學校時期短，劉福才在該時期所交往的教育圈人脈也次於與親屬接觸之頻率。從網絡規模來看，親屬與學校網絡基本上呈現幾乎分離的情形。雖然此時期學校網絡規模並不大，但從其中人物彼此皆平均連接的情形，可知其彼此之間的連接度高，代表兩個節點之間若無連結，則可透過越少的節點便可連結到對方。其說明了劉福才對於校園事務的關心，有很大程度是透過與同事之間的接觸與交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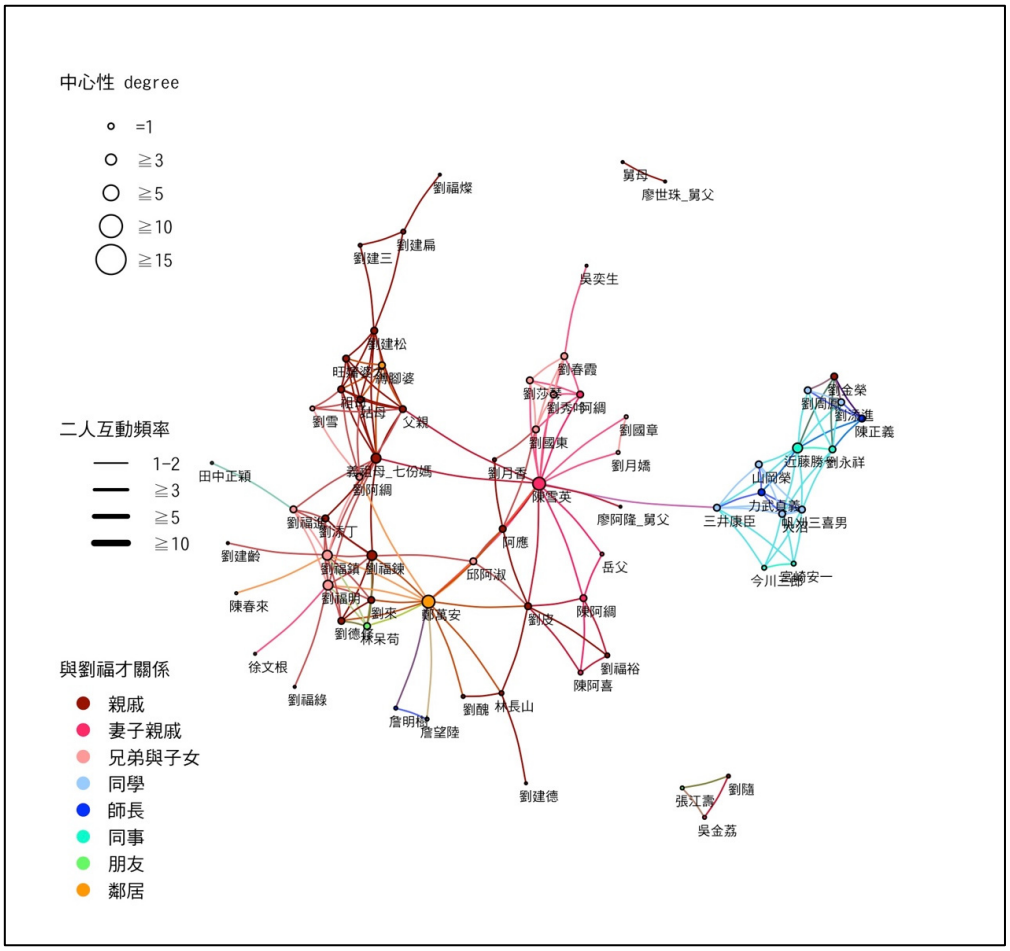

圖 7　劉福才任職東勢農林國民學校時期之社會網絡圖

（五）青年教職：新社公學校（1934 年 4 月至 1941 年 3 月）

進入青年教職後期，劉福才告別了農校四年「愉快、親密有趣」的生活，在「寂寥憂鬱」的心境下，[41]再度返回新社公學校服務。[42]職場的轉換似乎帶給劉福才巨大衝擊，進而影響此時期日記

41　劉福才，《劉福才日記》（臺北：中央研究院臺灣史研究所檔案館藏），第 2 冊（1933-1949），檔案號：T1091_002-0018、T1091_002-0019。

42　本文對照《劉福才日記》與《臺灣總督府職員錄》之搜尋結果，發現劉福才於 1921 年至 1940 年間之服務單位均為臺中州新社公學校；後自《臺灣總督府報》中查知，其曾代表「臺中州農林國民學校」投稿，並當選久邇宮殿下教育研究物「尋常小學國語讀本第六學年用補充教材」，因此認為劉福才應只是短暫借調於東

之寫作結構。「圖 8」顯示，親屬網絡形成以妻子陳雪英、岳父、父親與兒子劉國東為中心的強聯繫網絡，在聯繫強度上亦強於前一時期，可知除該時期親屬間的互動頻率更勝以往之外，日記的寫作結構亦偏重於此。在網絡結構方面，相對於東勢農林國民學校時期，新社公學校同事網絡相當零散且無主要中心人物，而以道山一夫校長為主要中介中心，主要與荒木潔郡視學、同事劉紹宗（?-1966）、張庚水（?-1936）等連結，主要因為此時道山校長尚身兼大南青年團團長，經常前來提供給新社青年團大南分團作為聚會所的劉福才家中拜訪，而在劉福才的親屬網絡與同事網絡間位居網絡之要徑，其所擁有的社會地位掌握了訊息、權力等資源，顯而易見其中存在結構洞之優勢。[43]而劉福才也因為與校長之間建立了良好的關係，甚至曾任校長代理以替校長不在時處理校園事務，雖無法自網絡圖直接判斷，但閱讀日記可知，相對於東勢農林國民學校時期擴展了劉福才的教育圈人際關係。

呈上所述，在網絡結構方面，本時期另有四組網絡與主要群體分離，分別為以劉福才母親娘家親屬（以舅父廖阿隆為中心之

勢農林國民學校協助教學。參見劉福才，《劉福才日記》，第1冊（1900-1932），檔案號：T1091_001-0001~T1091_ 001-0177；劉福才，《劉福才日記》，第2冊（1933-1949），檔案號：T1091_002-0001~T1091_002-0096；中央研究院臺灣史研究所，「臺灣總督府職員錄系統」，〈http://who.ith.sinica.edu.tw/s2g.action〉（2020/3/14）；〈教育研究物當選者〉，《臺灣總督府報》（臺北：國史館臺灣文獻館，1931），典藏號：0071031172a005，1931年2月11日，第1172號，頁35。

[43] 官制青年團的成立，恰為劉福才藉由其公學校菁英地位發揮其地方社會網絡影響力，以及擴展人際關係網絡的途徑。日本總督府以街庄層級建置青年團，目的不僅為緩解地方人民對於殖民政府的抵抗，也是為了將地方的社會領導階層之青年，培養成為街庄層級之有力者。加入青年團者，亦代表了同一世代地方菁英的共同選擇。由此，恰可說明為何劉福才並未同知名社會菁英如林獻堂、蔣渭水、蔡培火等人，參加文化抗日運動。參見宮崎聖子，《殖民地臺灣之青年團與地域變貌》（臺北：臺大出版中心，2019），頁5-27。於此之外，由日本人擔任之青年團團長所掌握的資源與其身分地位，除了顯示其係來自政府組織所賦予之權力之外，更在透過對青年團成員（中下階層）管理的過程中，展現出地方青年團由下至上的階層化權力網絡的部屬，可參閱施添福對於「三層空間──街庄民空間」之定義，了解街庄層級之空間認同的凝聚過程及其內涵。參見施添福，〈日治時代臺灣地域社會的空間結構及其發展機制──以民雄地方爲例〉，《臺灣史研究》，8：1（臺北，2001.10），頁1-39。

網絡）、三組教育圈與政府人員網絡（一為劉永祥、陳賢宗、詹望陸、詹清肅〔1888-1946〕；二為近藤勝一、細山田武雄；三為岡田寬吉、劉周鳳）。觀察日記可知，近藤勝一與細山田武雄為此期間之前後任新社公學校校長，因此產生聯繫。然而在網絡圖上看不出劉永祥等人與以道山校長為中心之新社公學校網絡有聯繫，可能原因為劉福才此期間的日記並無每日記載（或可能在翻譯時刪去），其結構顯得相對鬆散，日記中這幾位同事在實際校園生活中經常接觸，囿於資料限制，而使網絡圖中無法呈現有較強頻率之聯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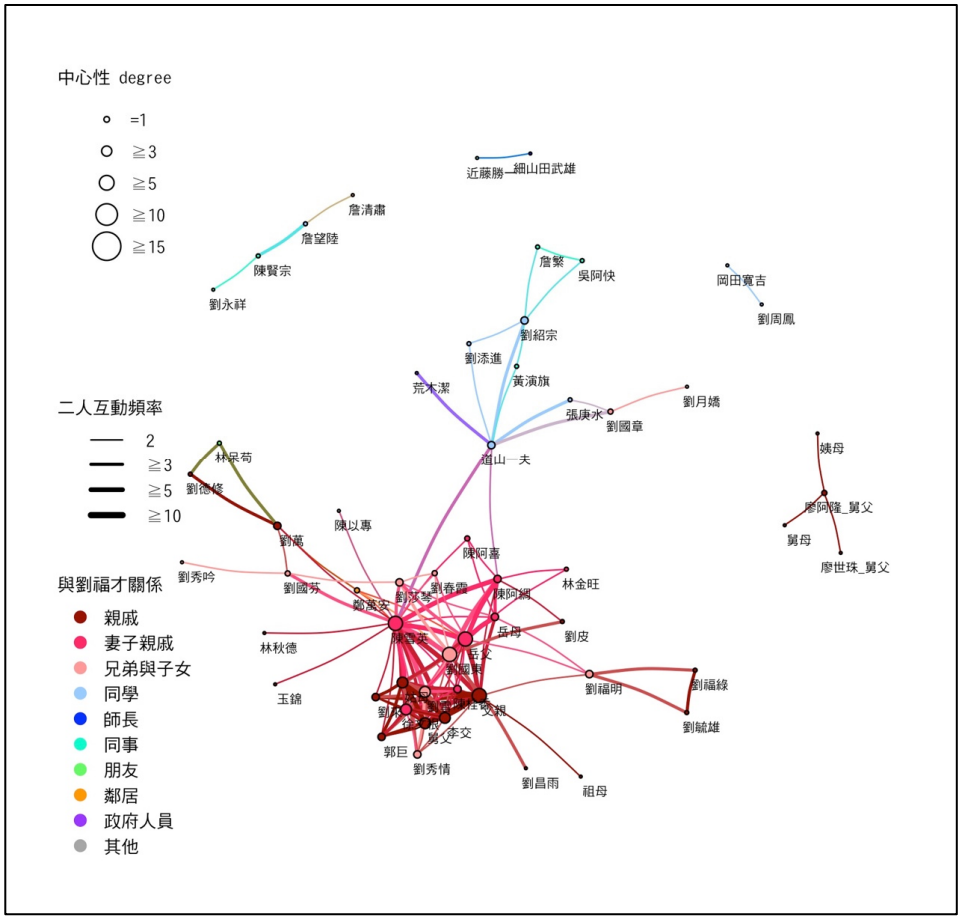

圖 8　劉福才任職新社公學校時期之社會網絡圖

（六）中年時期：大南蔗苗養成所（1941年4月至1941年11月）

昭和 16 年（1941）4 月起，劉福才暫別了服務屆滿二十年的教職，離開新社公學校，轉職蔗苗養成所。[44]由於劉福才在蔗苗養成所服務的時間只有短短八個月，日記中出現的人物頻率不高，蔗苗所同事的人名僅提及一至二次，亦未出現在後續日記之記述中，主要與劉福才在大南蔗苗養成所服務的時期過短，且在此時期提到的同事們亦未在後續日記中繼續出現，因此無法就同事網絡作社會網絡分析。其中，同事王水鄰由於住的近而經常陪伴劉福才騎自行車返家，也因此與親屬網絡有所連結，其顯示空間地理的鄰近性影響了社會網絡的組成（可同理參照鄰居黃六氏_阿本兄在網絡中的位置）。觀察「圖 9」，此時期其實並未有明顯的中心性人物出現，網絡中大部分節點都互相連接；然而也由於此時期時間過短，僅有一條將兒子劉國東與親友鄰居劉萬（1923-1972）之間連結的弱聯繫關係，使得劉福才的大南蔗苗養成所時期網絡分為兩個結構，囿於數據不足而難以檢視原因進行分析，亦無法代表其具有中介性。值得注意的是，日記中對於子女的描寫比重，亦在後期隨著子女逐漸成長而逐漸增加，使得此後的親屬網絡中以子女、妻子為主之中心性日漸提高。

[44] 臺灣總督府編，《臺灣總督府職員錄》（臺北：臺灣日日新報社，1941），頁 141。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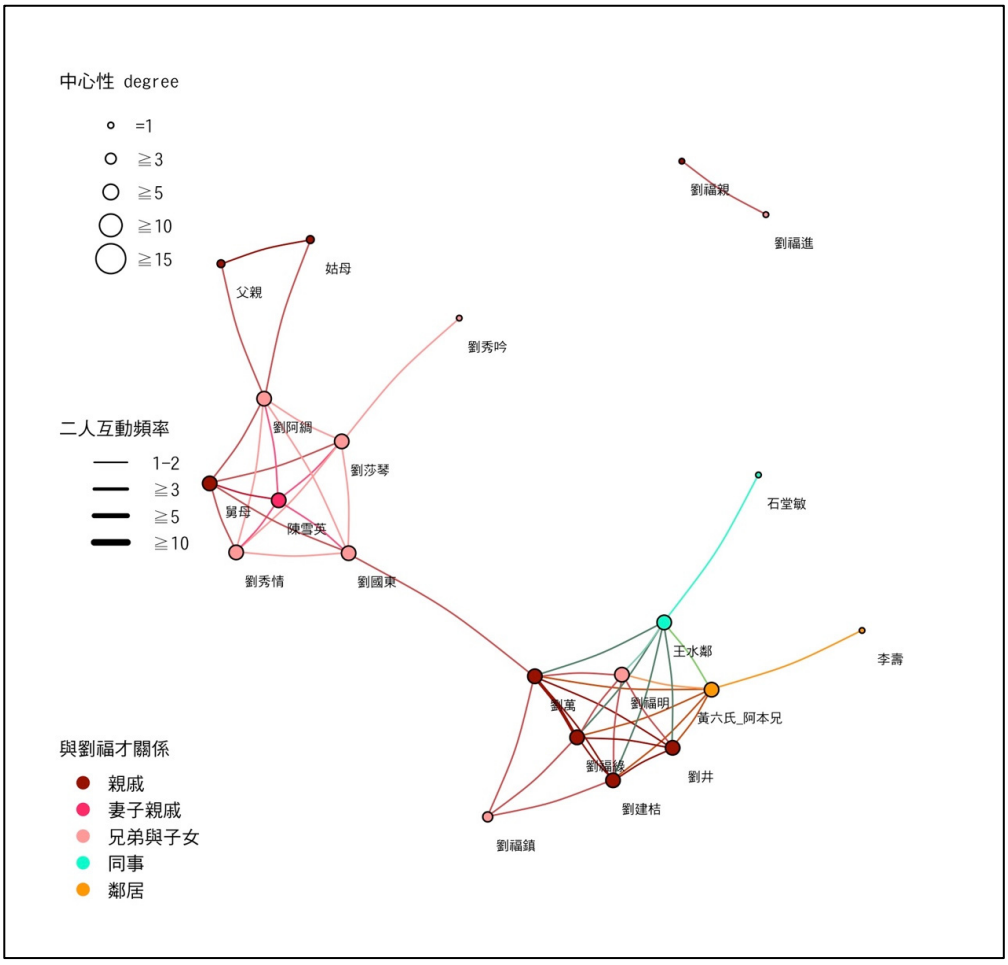

圖 9　劉福才任職蔗苗養成所時期之社會網絡圖

（七）中年時期：新社庄役場（1941年12月至1945年6月）

劉福才進入新社庄役場服務的階段雖然有五年之久，但是網絡規模卻相當小，網絡組成幾乎只有親屬。[45]觀察「圖 10」，可知該時期《劉福才日記》撰寫中心著重於妻家親屬網絡上，意味著由陳雪英所聯繫的關係網絡是此時期劉福才的關注焦點。就網絡結構來看，每個關係的最短距離最多亦不超過6人，因此亦無形成親屬以外的社會關係網絡。

45　此段時期劉福才未被《臺灣總督府職員錄》收錄，可能原因為當時職員錄並未收錄庄長以下之職員資料。

綜觀之，網絡規模的縮小主要與日記所側重之篇幅與書寫頻率有關。觀察《劉福才日記》大量提及家庭成員，可見劉福才的生活重心以親人及家族為主。反之，劉福才工作上接觸的對象多為庄民，日記並未對同事有太多的著墨，相對於新社公學校時期的教育圈同事網絡有相當大的差異。因此，對比網絡圖與日記內容，劉福才雖每月提及各種庄役場工作項目與庄務，但此階段親友以外人物網絡規模卻近乎於無。在書寫頻率方面，日記之紀錄日期常有缺漏，顯示此時期可能疏於書寫日記或者內容有所刪減，而導致於網絡原始資料不足（日記有缺的月份是：1943 年的 9 月至 12 月、1944 年的 1 月、3 月、7 月、12 月、1945 年的 1 月至 3 月）。再其次，劉福才在此時期歷經戰爭導致的重大變革，包括時常面臨空襲與糧食缺乏，到後來庄役場解散、職員回歸農田；身處於政局動盪與政權轉移的紛亂下，可能因此影響到劉福才寫日記的頻率，甚至是心理因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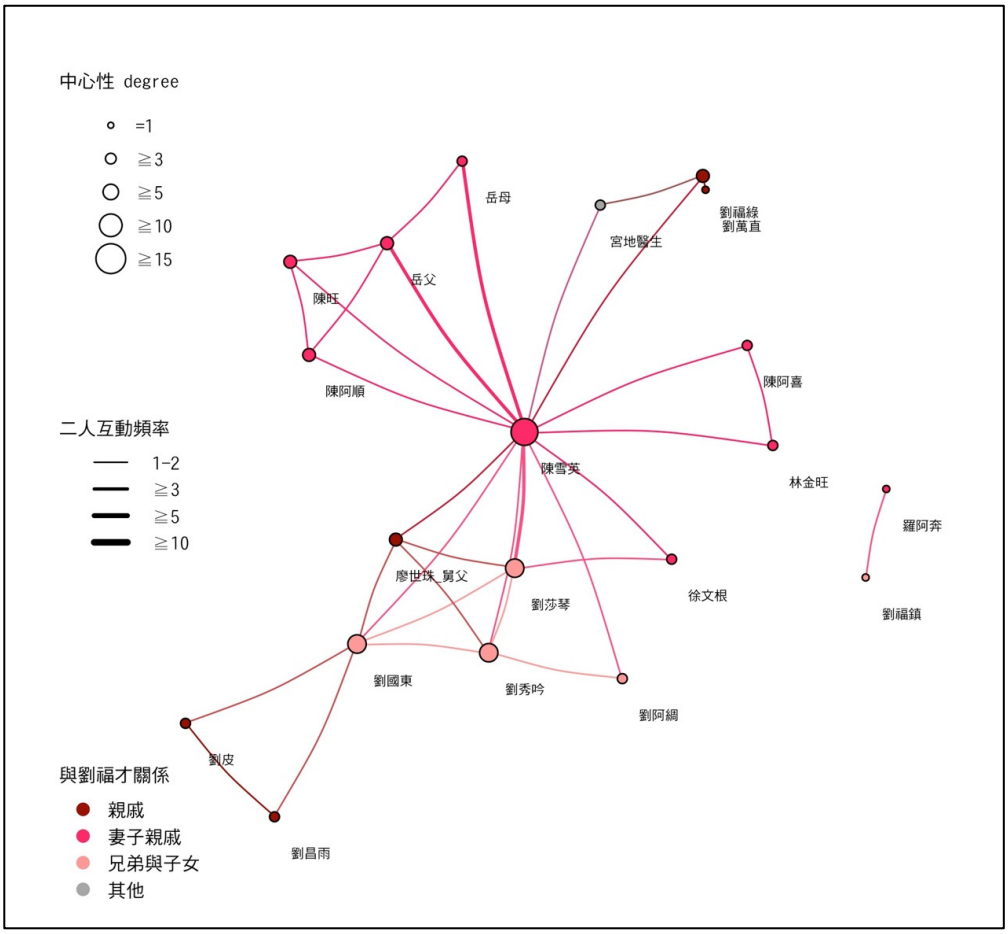

圖 10　劉福才任職新社庄役場時期之社會網絡圖

（八）中年時期：新社農校校長（1946年1月至1952年1月）

昭和 20 年（1945）6 月，劉福才於新社庄役場的工作告一段落之後，就一直賦閒在家務農為生。太平洋戰爭結束後，在當時東勢區長賴文良（1907-?）的推薦下，劉福才以其長達二十年的豐富教職經驗，於民國 35 年（1946）1 月起至民國 41 年（1952）1 月，擔任臺中縣立新社初級農業職業學校的校長。[46]為了協助寄宿生的管

46 「臺中縣立新社初級農業職業學校校長劉福才委充案」，〈臺中職業學校校長任免〉，《臺灣省行政長官公署檔案》（南投：國史館臺灣文獻館藏），典藏號：00303233054001，1946年12月26日。

理而搬至校長宿舍，任職校長與生活環境等轉變皆對劉福才的社會網絡組成造成了影響。觀察「圖 11」，可發現日記記述重心轉移到同事與教育圈相關政府人員之關係網絡，相對之下親友的網絡規模則大幅縮小。而該時期教育圈中心性人物以東勢區長賴文良的後續接任者張博寰為主，其串聯了劉福才以妻子為中心之家庭網絡、劉家親屬網絡，以及學校同事網絡。至於同事網絡之中心楊順財、陳正義等人，也在日記中經常被提及，是此時期工作上的重要夥伴。而劉福才身為校長需要特別關注學校人事、庶務等各種事務，因此日記亦多次紀錄引發事件的劉嘉武（1923-1950）、王三川等問題職員，而恰好形成網絡中的重要節點，並同時可視其為劉福才人際網絡中反面中心人物範例。[47]除此之外，最初引薦他擔任農校校長的東勢區長賴文良與時任鄉長之陳正義，則成為劉福才串聯當時政界網絡的人脈中介中心，也為下個階段臺中縣議員時期的人際網絡基礎奠定良好基石。

就網絡結構而言，除了由同事、政治圈與親屬所構成之主要網絡外，另有由詹德境、劉紹宗、劉添進（1901-1992）、江萬連、楊坤龍等組成之國民校長網絡，該網絡成員常因工作關係相聚而形成相當平均的關係網絡，為劉福才特別重視之教育圈人脈。而綜觀劉福才任職校長時期的各面向指標，可見許多地方名士成為該時期網絡的重要中介點，如詹蘭亭（1890-1958）、陳正義、賴文良等。綜上所述，與以往單純任職教員時相比，劉福才擔任新社農校校長時期所接觸的重要人物，除大幅擴展了其社會網絡規模，同時也為劉福才此時期末兩年擔任臺中縣議員時，提供了重要的人脈與更多的政治資源和社會聯繫。

---

47 劉嘉武雖是在劉福才擔任新社農校時的同事，但曾引發毆打事件，後來又因思想事件（被當局認定有共產思想）遭到逮捕、槍殺。劉福才於日記中多次提到共產思想的連帶事件，因而對於問題人物避之唯恐不及。參見劉福才，《劉福才日記》，第3冊（1950-1964），檔案號：T1091_003-0004。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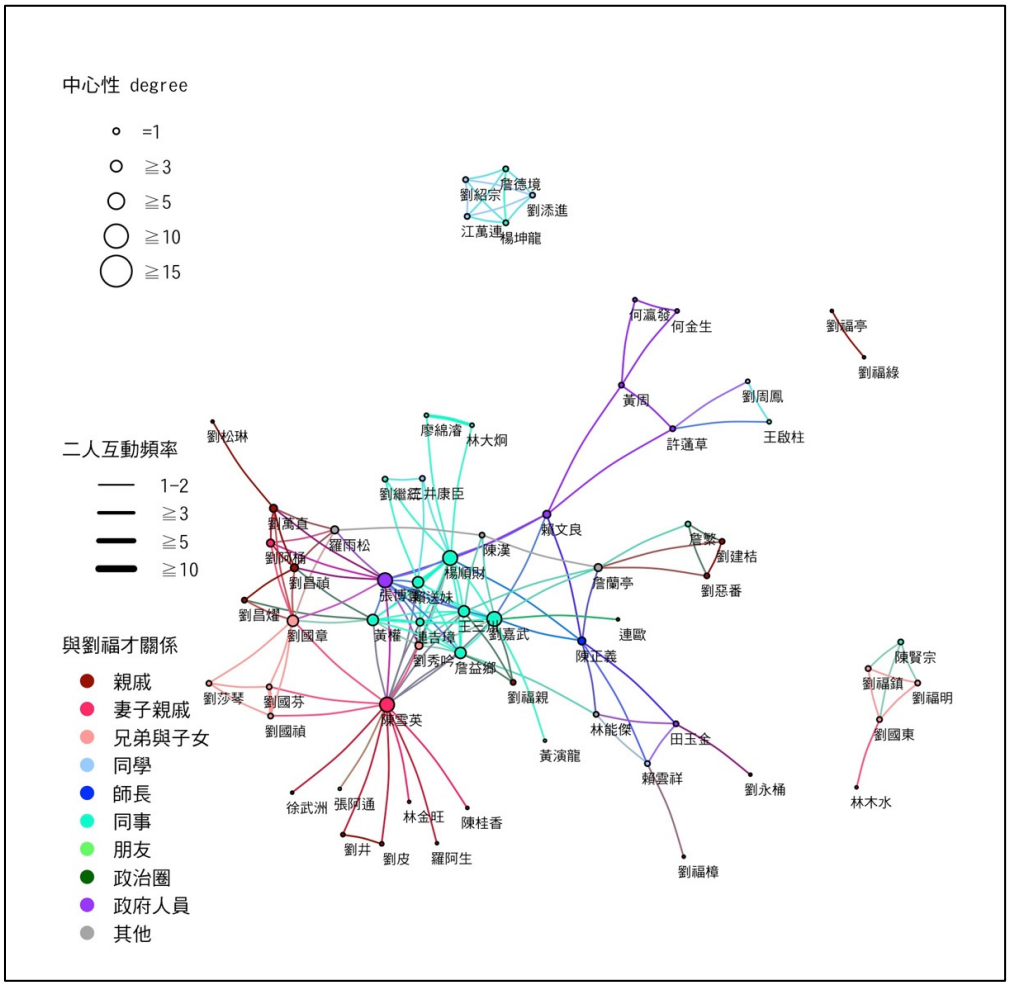

圖 11　劉福才於新社農校擔任校長之社會網絡圖

（九）中年時期：臺中縣議員（1951年1月至1952年1月）

民國 39 年（1950）底，劉福才開始投入臺中縣議員選舉，在獲得大南全村的支持下，以第四高票當選縣議員。[48]接下來的從政生涯雖然僅有短暫的一年，不過卻是原本自認「為一個教育者，最

[48] 劉福才擔任臺中縣議員資料，參見不著撰人，《臺中縣議會第一屆第一次定期大會》（臺北：臺灣省參議會，1951）。取自中華民國國家發展委員會建置，「臺灣議事資料開放平臺」。〈http://doi.org/10.6731/TCCC_proceedings.007c-001-R1-01524900〉（2020/03/15）。

忌捲入政治運動」的劉福才，一生中非常不一樣的片段。[49]此時劉福才除了從事政治活動，也經常介入地方事務的調解。從「圖12」即可觀察到與前段時期網絡的明顯差異，以政治圈為主的網絡相當集中，而與親人及其他網絡之間沒什麼聯繫；也可能是這個時期過短，妻子陳雪英甚至消失在網絡中。就網絡結構而言，此時期規模雖較前期稍小，但在短短一年間能夠出現如此高強度聯繫的多中心網絡，顯示該時期網絡密度極高，也因此缺乏主要的中心性人物。然而相對地，時任臺中縣農會理事的田玉金則位居政治圈網絡的重要中介中心，其同時聯繫多個劉福才親屬與政治圈網絡，其次則有林鶴年（1914-1994）及廖綿濬，[50]亦分別為政治圈及教育圈之間的中介節點。至於在此時協助劉福才參選議員，並居中聯繫相關事務的除親屬之外，曾為職場同事之劉紹宗、陳賢宗等人也鼎力支持，因而與政治圈之彭聯喜、[51]劉己秀、陳來水及詹明樹（1892-?，時任新社鄉長）等出現聯繫，形成一個多中心之社會關係網絡。可以說，該時期正是劉福才的政治圈社會網絡黃金時期。

49　劉福才，《劉福才日記》，第3冊（1950-1964），檔案號：T1091_003-0011。

50　林鶴年為霧峰林家林紀堂四子，乃戰後臺中縣紅派創始者，曾任臺中縣第一、三、五屆縣長。參見鄭瑞明、溫振華、戴寶村、施志汶、陳國川、廖振富、黃繁光、蔡錦堂，《新修霧峰鄉志》（臺中：霧峰鄉公所，2009），下冊，頁1566。

51　彭聯喜為曾任新社信用組合理事及新社庄協議會員的彭煥郎之長子。資料參見新社鄉誌編輯委員會，《新社鄉誌》，頁461-462。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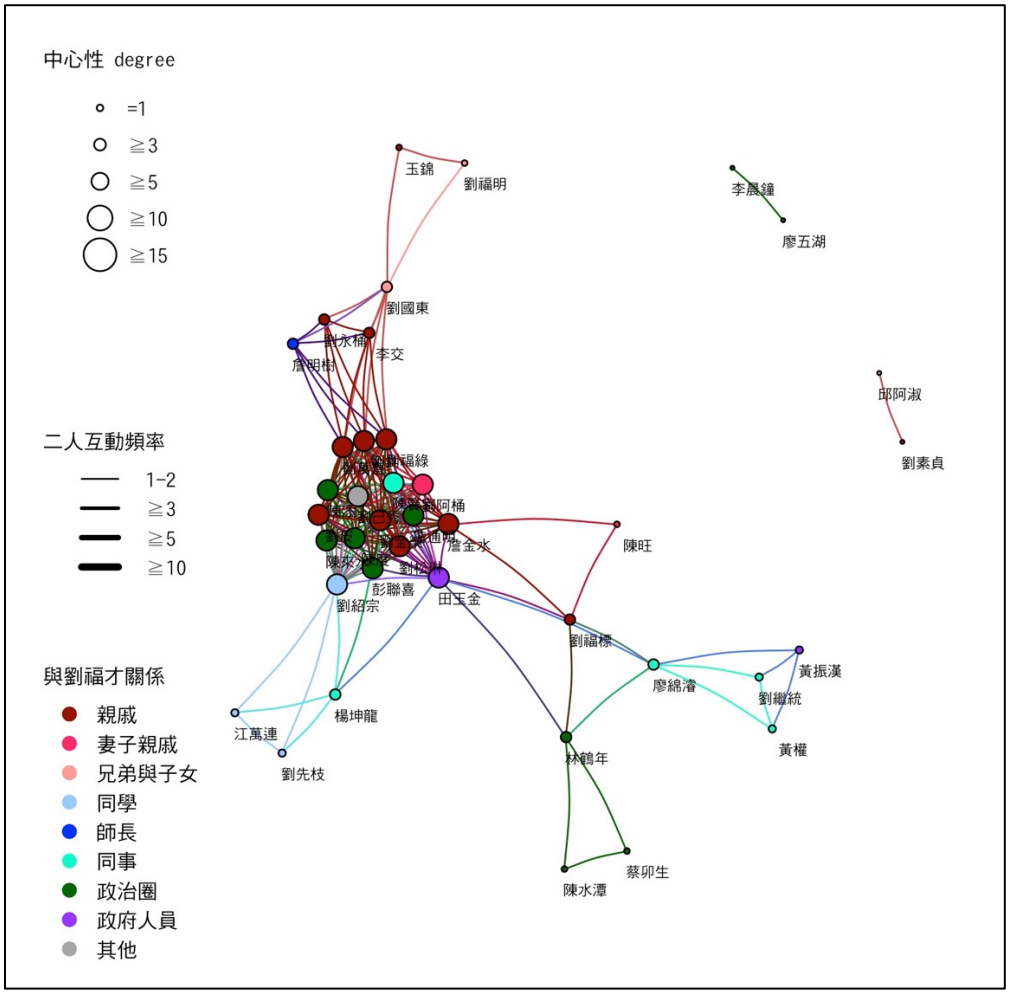

圖 12　劉福才任職臺中縣議員時期之社會網絡圖

（十）晚年時期：選鄉長、經商（1952年2月至1954年8月）

劉福才在議員任期年滿後，由於親屬、政界友人的推薦與多方考量下，退出議員選舉並參選新社鄉鄉長。就網絡結構而言，該時期網絡規模產生改變，出現許多跨網絡之中介節點。劉福才的親屬網絡的規模超越前期，身邊協助他參選的親人主要有劉福進、劉松琳、劉福慶、劉福綠（?-1963）等人，叔父劉金榮為此時

期親屬網絡與政治圈網絡的重要中介節點。[52]其中，政治圈網絡規模大幅縮小，其網絡組成延續自前時期臺中地方政治圈人物、政府人員，如彭聯喜、林鶴年、田玉金等人，在劉福才參選鄉長時期仍與其頻繁接觸。[53]不過，期間劉福才不願受政黨控制而中途退出鄉長選舉。觀察日記內文可以發現，自1953年5月11日至5月17日之選舉期間，劉福才曾仔細描寫出這段時期的心路歷程。摘錄相關內容如下：

> 五月十一日　傍晚田玉金和許等二氏乘車來訪。他們說「李議長、何主委、馬秘書等，為調解來在新社，在張茂盛的宿舍等候」，遂同車而去。對方則彭煥郎、彭聯喜、邱養、詹昭宗、陳田安、陳葉貴、陳西欽、連歐等，五虎六將皆出洞。空氣緊張苦重。而我只一人，所謂孤軍奮鬪呀！彭鄉長退讓的條件，提示如左記：「一、現在的人事、不可異動、將來若總幹事、課長有退職者，應由鄉公所內昇用，不得由外部任用。二、鄉造林地之造林，絕對要進行，預算應優先編入。三、大南國校二間之建設費六萬元，應變更為鄉內十四教室之修繕費。四、三義糖廠監事三名，不再增加，役員應無報酬。五、新設鄉長辦公費，應充為貧民救濟金。六、開往抽藤坑的バス（巴士），應努力實現。」我逐一反駁，遂和他議論，興奮之餘，蹴席而出。許等氏追來勸誘，乃再復席，但是已無心討論了，少頃就散會，走夜路而歸。[54]

52　叔父劉金榮後來繼劉福才退選後登記參選鄉長，卻敗於受縣黨部支持的彭煥郎。參見劉福才，《劉福才日記》，第3冊（1950-1964），檔案號：T1091_003-0038、T1091_003-0040。

53　關於上述臺中地區政治圈人物，有多篇針對臺中地方派系之形成與轉變的研究，可加深讀者對於臺中政治派系代表人物及其所形成的政治關係網絡之認識，參見王業立、蔡春木，〈從對立到共治：臺中縣地方派系之轉變〉，《政治科學論叢》，21（臺北，2004.9），頁189-216；王靜儀，〈臺中縣地方派系之形成背景與組織結構（1951～1987）〉，《臺灣文獻季刊》，54：3（南投，1993.9），頁309-339。

54　劉福才，《劉福才日記》，第3冊（1950-1964），檔案號：T1091_003-0035。

> 五月十六日夜間十二時，縣黨部曲組長及詹昭宗又驅車載而來，且說：「何主委在等候，請坐車同去。」仍伴著國東，去陳西欽的二階。何主委、曲組長以外，彭煥郎父子及其爪牙，約有十名在那裏。彭煥郎看起来，很苦惱煩悶的樣子，抱頭而呻吟，遂倒卧床鋪。彭聯喜一人，強主張其惡意的條件，但是我仍然拒絕不理。曲組長站起來說：「你是黨部提名的，故黨部叫你這樣，就要這樣。」就是高壓的非承認不可的狂吠。……我也不覺激昂起来：「黨部是擁護誰呀？我無意做鄉長，提名也不要，取消好了。」怒吋而跑出外面，冒雨而回家，四時許，才就床睡眠。[55]

> 五月十七日　投票日。但是早晨在各投票所既貼出「候選人退去資格，選舉延期」的公告。選舉中止了。選務担當者，以及選民，皆似被狐狸所騙，成陣來問因由，或不滿而憤慨，當然耳。我出去新社，講解退出的理由，皆了解我的立場，有的在罵縣黨部，怕惡勢力的做法，有的在攻擊彭煥郎的狡猾欺人。識論紛紛。[56]

由此可知，劉福才從因遭遇政黨的操弄，而降低了與政治圈人士的交流頻率，使其政治圈的網絡並未能持續發展下去。

其次，劉福才此時期的經商主要有兩個階段，其一為由政治圈所牽線之種苗繁殖場的蔗苗包運。其二，劉福才自新社農校校長退職後，[57]頓失經濟來源，便透過葉火城（1908-1993）的牽線，和以往建立的教育圈與政治圈所累積之人脈，才得以順利在短時

---

55 劉福才，《劉福才日記》，第3冊（1950-1964），檔案號：T1091_003-0037。

56 劉福才，《劉福才日記》，第3冊（1950-1964），檔案號：T1091_003-0038。

57 劉福才於擔任臺中縣議員期間，於民國41年（1952）1月10日同政治圈網絡之田玉金、劉福鏢、廖綿濬同訪當時的臺中縣長林鶴年，並申請新社農校校長之退職，推測劉福才退職之理由可能與後續政治圈發展（新社鄉長參選）有關。參見劉福才，《劉福才日記》，第3冊（1950-1964），檔案號：T1091_003-0026、T1091_003-0031、T1091_003-0033。

間內透過經商度過經濟困難；由此，產生了由張炳南（1924-2014）、葉火城之二人組網絡，以及相關之教育圈同事與政治圈網絡。觀察「圖 13」之社會關係網絡可知，自此之後《劉福才日記》的記述重心便逐漸轉變為以親屬網絡為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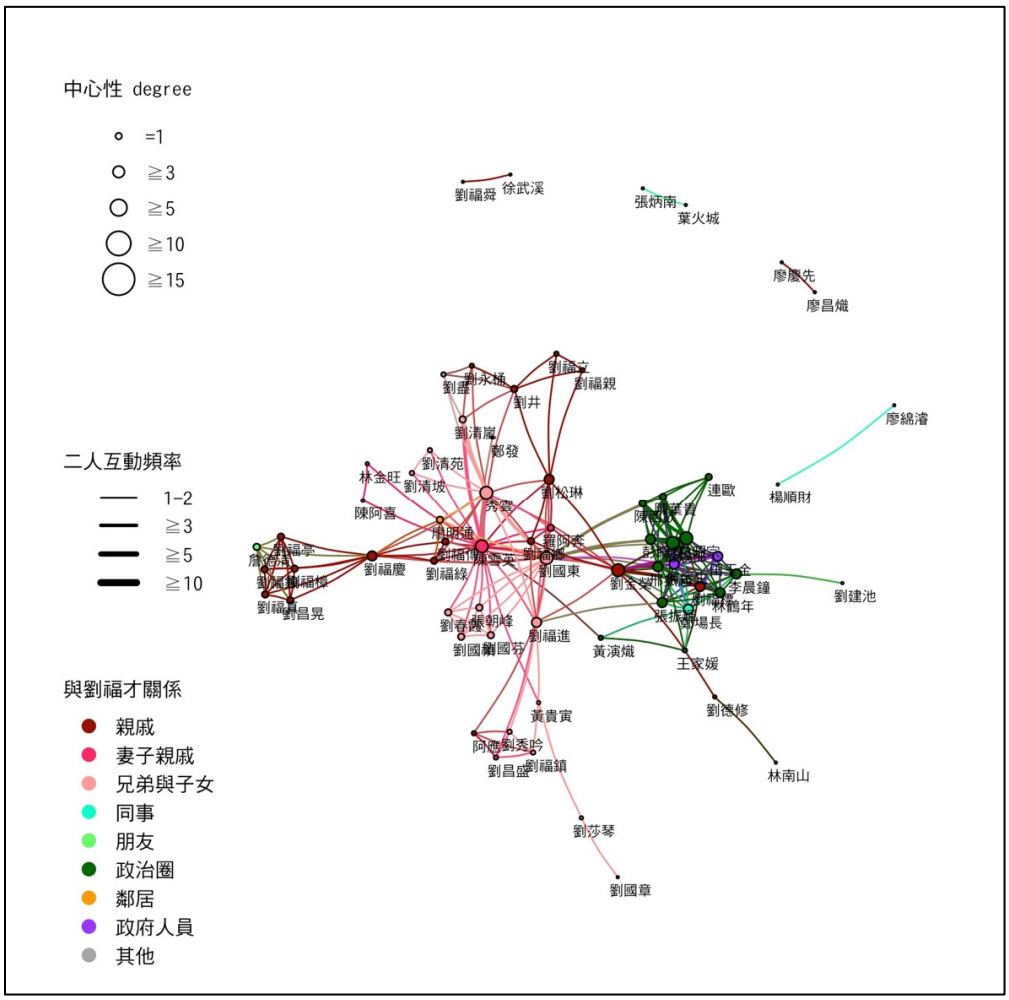

圖 13　劉福才參選鄉長與經商之社會網絡圖

（十一）晚年時期：新社農校（1954年9月至 1963年12月）

劉福才放棄從政的念頭且重執教鞭之後，家族的親友又再次被大量地記錄在日記當中，呈現由妻子、成年子女、姻親、劉家親屬，所建立之強聯繫親屬社會網絡。也由於日記詳細地記載親友間事件，無論是正面或負面皆構成了劉福才社交網絡的一環，關係聯繫頻率的高低亦展現出劉福才所關注的人物與事件的面向。然而，其他類別網絡規模在此時期逐漸縮減，儘管劉福才仍未忘情政治而偶而述及與政治圈人物的互動和助選活動（如林鶴年、王地的二人組網絡），然而隨著年紀漸老，對於政界的參與和影響力也逐漸降低，政治圈網絡已大幅萎縮。除此之外，即使肩負教務主任之重擔，並同時身兼供民眾進修之國文講習會講師，其他如校務以及與同事間關係也已非此時期日記的記載重心。綜言之，觀察「圖 14」的網絡結構，以具集中度之強聯繫親屬關係網絡為主，該網絡中的人物之間連結的頻率極高，顯示出其具有相當高之群聚度。其次則為由對象以學生等學校事務記述中心的劉錫道、楊文德等人構成之學生網絡，而未見同事網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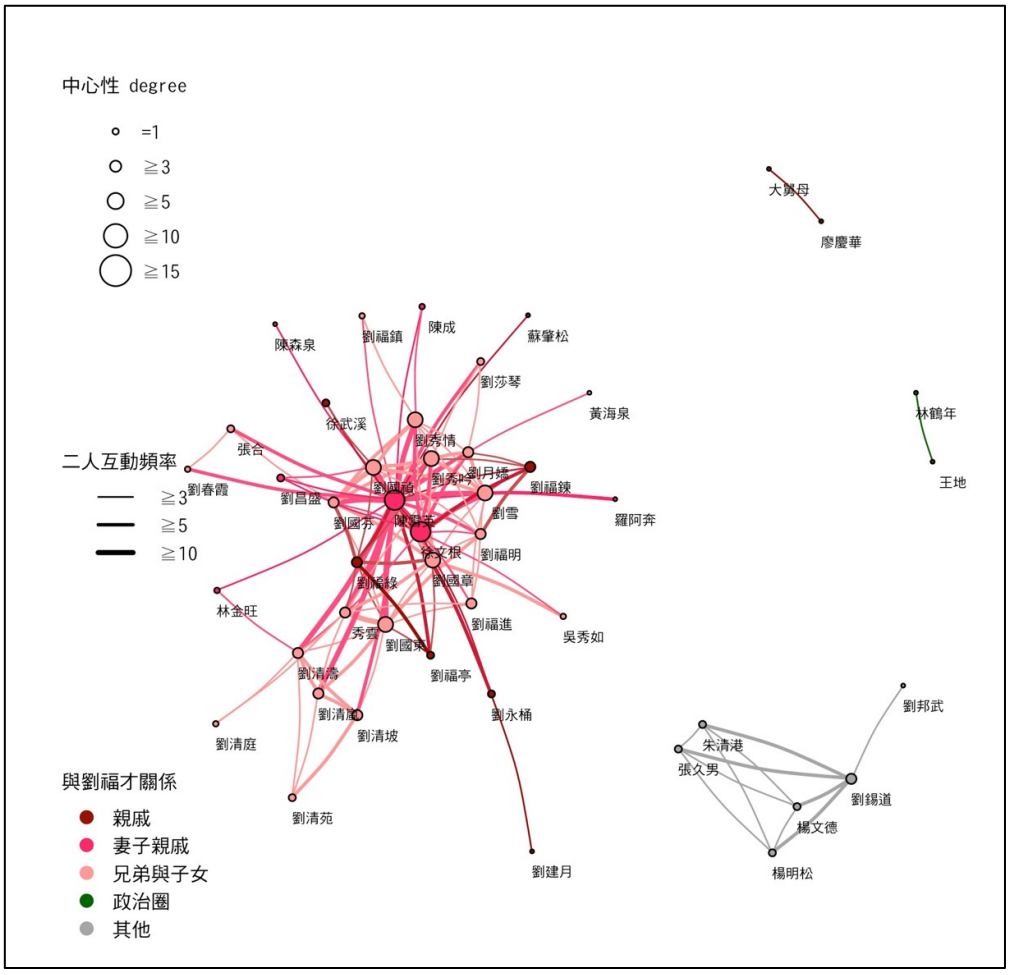

圖 14　劉福才任職新社農校時期之社會網絡圖

（十二）晚年時期：退休前期（1964年1月至1970年12月）

本文將劉福才晚年退休時期，再細分為兩個階段，即以妻子陳雪英去世的時間點（1970年），區分為退休前期（1964年1月至1970年12月）及退休後期（1971年1月至1977年6月）。[58]退休前期，由於身體狀況尚稱強健，平日以務農、兼課為主；閒暇之

[58] 本文如此處理，主要是考量到劉福才退休後，可能因閒暇時間較多，相關瑣事的記載也最為豐富，若是直接將此階段的社會關係網絡呈現出來，將顯得相當雜亂無章。因此，本文將劉福才將退休後前、後兩個時期的網絡進行權重處理，此時的人物必須被記錄兩次才會被呈現出來。

餘，或互訪親友，或與家人聚會、處理地方性宗教事務、出遊的記載也大幅增加，加上子女輩陸續在這個階段成家、立業，以子女為主之網絡因此擴大並且成為中心。相較之下，劉家親屬網絡與妻家網絡則相對縮小。因此，該時期網絡規模又較前段時期為大，並主要集中在以兄弟與子女為主之網絡，而呈現以親屬為主之多中心強聯繫網絡。至於一直陪伴在身邊的妻子，仍是此時期親屬網絡之中介中心人物。（參見「圖15」）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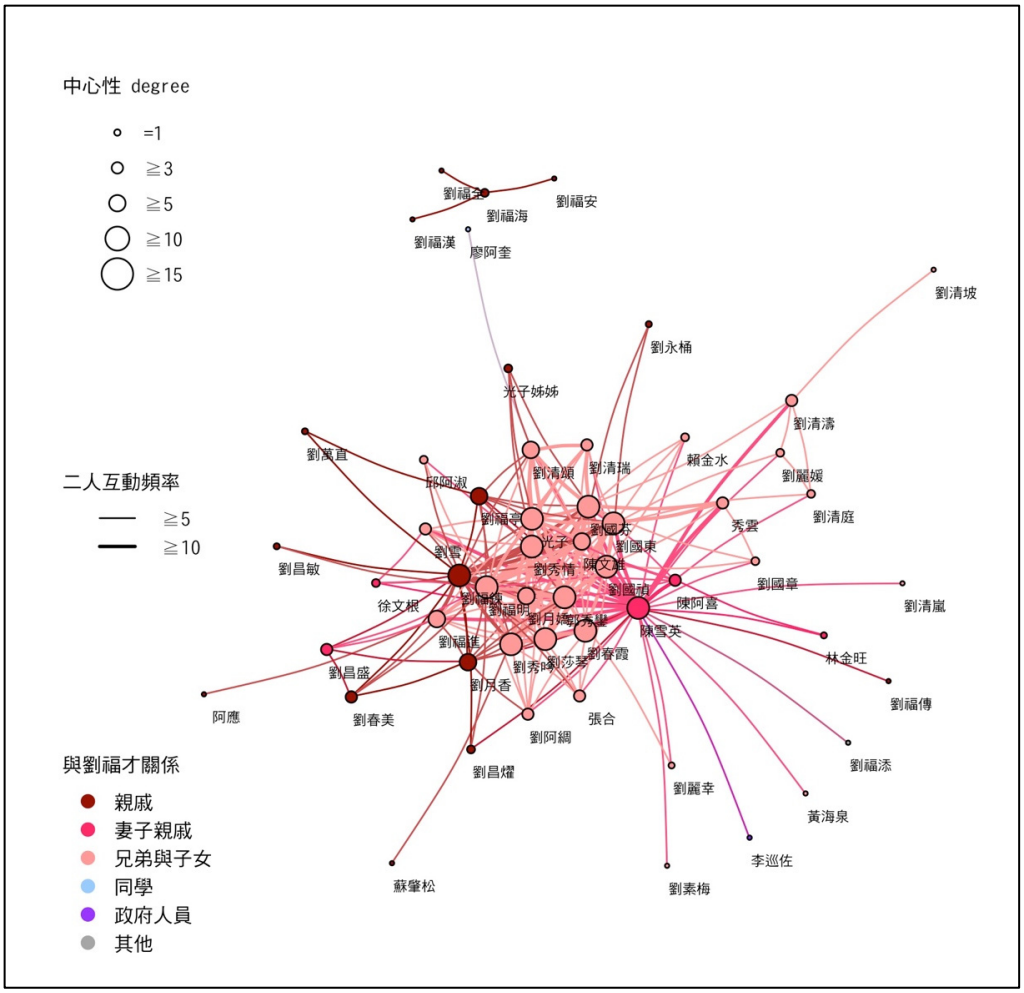

圖 15　劉福才退休前期的社會網絡圖

（十三）晚年時期：退休後期（1971年1月至1977年6月）

劉福才的妻子去世之後，其親屬關係之網絡規模明顯地縮減許多，由於同輩逐漸凋零，後輩間的往來減少，與妻家親戚之間的網絡亦大幅萎縮。另一方面，劉家的親戚和子女，則成為此一階段主要的網絡核心，也顯示出劉福才在人生的最後階段，儘管仍經常前往拜訪親友，不過已經不如退休前期那麼頻繁；偶有與以前的同事往來，也僅形成規模相當小之網絡（三井康臣、楊順財）。（參見「圖16」）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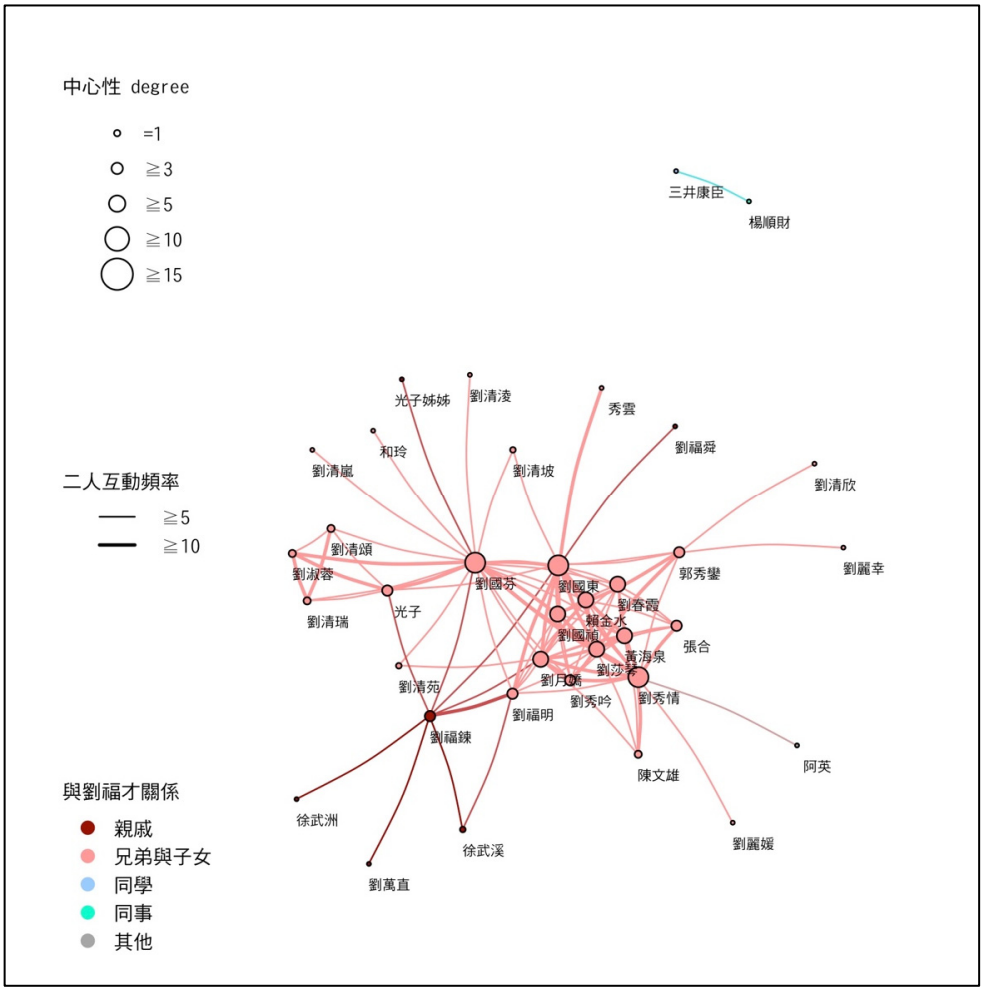

圖 16　劉福才退休後期的社會網絡圖

五、生命的軌跡與不同關係網絡

本文係依照日記文本之時間、人物與地點等「歷史文本資料」進行文本分析，藉由歷史性資料庫建構文本網絡。而在日記內容擷取的過程中，時空資料係成為拼湊出歷史網絡圖像之重要依據，而能更具脈絡性地了解橫跨日治到戰後之地方菁英的人生足跡。因此，本文藉由日記中人物與事件整理、建檔之時間、地點資料，建置劉福才人生足跡資料庫，並透過地理屬性資訊的整合，利用地理資訊系統（Geographic Information System, GIS）繪製劉福才一生的熱區圖。觀察「圖 17」可知，劉福才一生並未出國，其活動區域以臺灣為主，熱點集中於臺中及臺北地區。檢視日記內文，由於劉福才出生自大南，其與親屬的住家和活動範圍、工作地點都在中部，因此一生中有超過八成的時間都在新社、臺中地區活動。其次，臺北則是除了求學時臺北國語學校的所在外，也可能與臺北一直是臺灣的首善之都，許多的公務和活動都會在臺北舉行，因此成為劉福才一生中除了臺灣中部地區之外，停留時間最多的地方。除此之外，由於劉福才擔任教職的黃金時期都待在新社，對地方教育的耕耘不遺餘力，而許多足跡點甚至是由於教育工作相關原因才得以前往，故可推知地方菁英之社會網絡與地方互相依賴關係的程度與重要性，正好呼應了前述以歷史文本分析將空間地點作為分析單位，可能將影響地方社會菁英個人社會網絡的構成與特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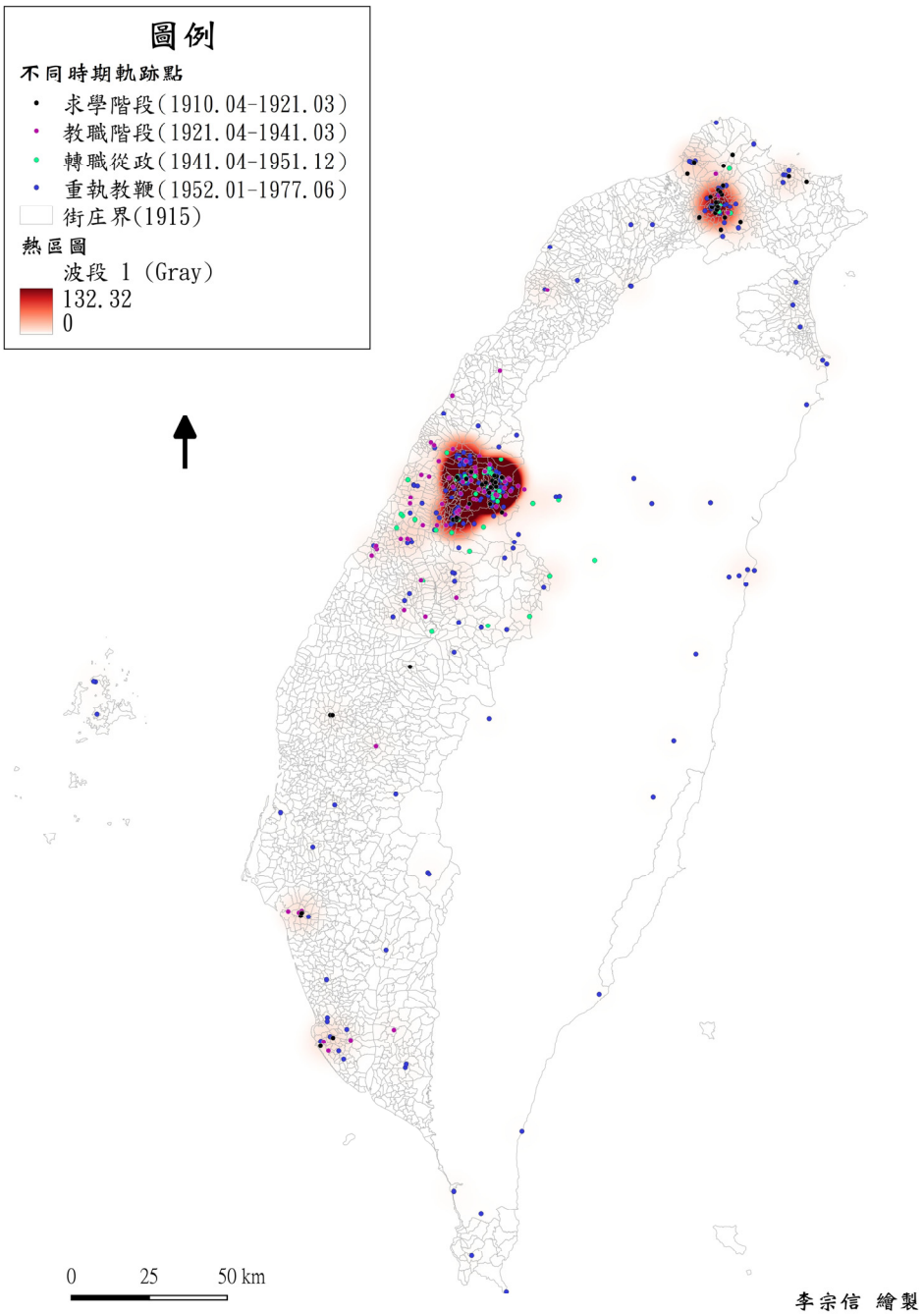

圖 17　劉福才一生足跡熱區圖（1910-1977）

說明：本圖繪製之不同時期軌跡點由色彩區分，原貌請參見《臺灣師大歷史學報》65 期全文電子檔。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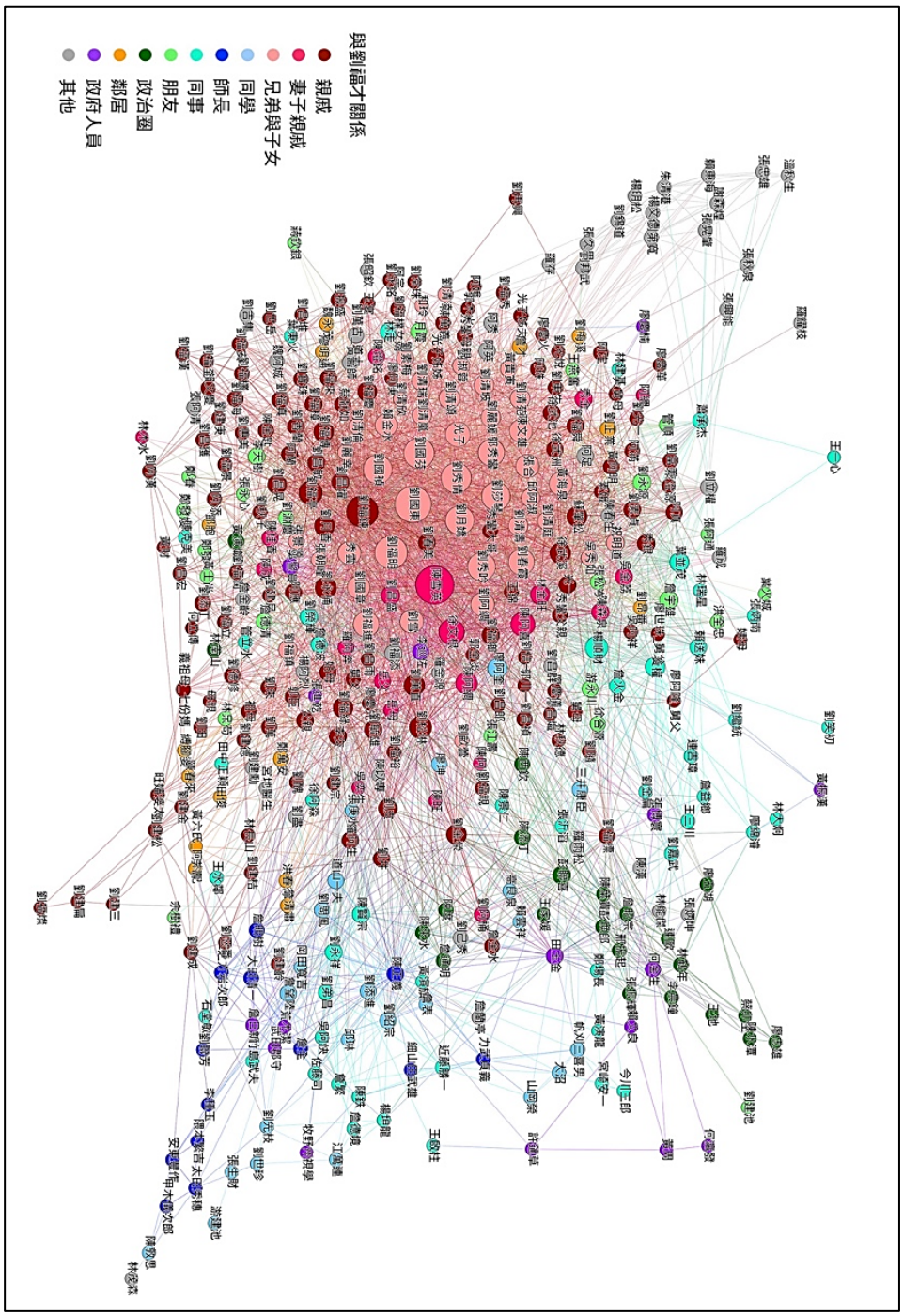

圖 18　《劉福才日記》社會網絡圖（1917-1977）

另一方面，若以《劉福才日記》所載的 60 年為尺度，觀察劉福才一生的社會網絡變化，則會由於網絡中行動者人數過多，無法針對細項加以分析。然而，若以此來檢視劉福才一生所接觸過的所有人際網絡之組成，則無疑是最快速、最一目了然的方式。我們自時間、地點的變化中抽離，可於「圖 18」中觀察到幾個劉福才社會網絡之特徵與面向。首先，如前所述，《劉福才日記》中述及的人物超過一千人，而藉由整體性地概覽一生社會網絡，可從中找出不同的關係網絡中的核心。換句話說，即可簡單回答劉福才生命中不同關係網絡中最重要的中心人物、中心中介人物，以及分別影響劉福才社交圈、工作圈，甚至是政治圈的人際網絡中心人物為誰，以及這些人際關係的形成對劉福才的一生帶來何等程度的影響力。以下就各項關係網絡圖依次說明。

劉福才一生中最重要的人，無疑為佔據「圖 18」中央，節點最大的妻子陳雪英，其係串聯劉福才親屬、妻家親戚、兄弟與子女網絡中的中介中心者。而就親屬網絡（參見「圖 19」）來觀察，妻子陳雪英亦同時是家族網絡中最為核心的人物，加上夫妻結褵長達 47 年（1927-1970），劉家分家時間又早，因此關於家族事務或情感面社會支持，皆是由妻子陳雪英與其子女所提供。除此之外，該網絡亦可簡單看出劉福才親屬之間的親疏關係；劉福才中心親屬網絡由兄弟與子女所構成，即子劉國東、弟劉福明、劉福鍊等，以此為中心形成了強聯繫網絡，顯然可見這些中心人物對劉福才的重要程度，甚至可以解釋為劉福才對其之依賴程度。再者，雖然本文並未針對其他姻親關係進行分類，但可透過「圖 19」所呈現的多種層次的親屬關係網絡證明，姻親是將兩個身處不同家庭的人聯繫成同一網絡的最短途徑（即為聯繫兩個網絡的中介），並因此拓展了劉福才親屬方面的人際關係網絡規模與結構，而陳雪英與其妻家親戚即為最好的範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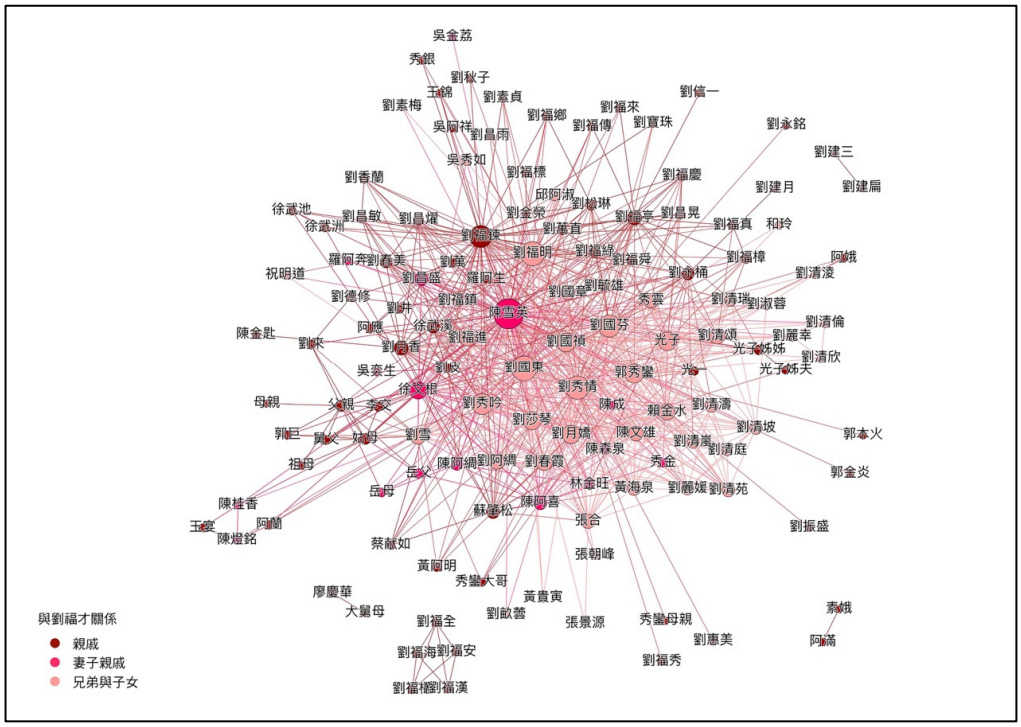

圖 19　《劉福才日記》中的親屬網絡圖（1917-1977）

此外，「圖 18」中的同學、師長及同事等網絡並未聚焦成同一個次群體之社交網絡，主要原因為其係分屬於幾個不同時期所建構之網絡。而對比「圖 20」，可發現網絡主要分為兩個次群體，一為以陳正義、劉添進、劉永祥、大田清一校長、道山一夫校長及詹望陸為主要核心之網絡；該網絡組成自日治時期，為自新社公學校就讀、就職時期，便開始維持聯繫之師長、同學及同事網絡，有些重要人物亦延續至戰後的同事網絡中之成員。其中，公學校校長不僅在臺灣社會中扮演著行政官僚的角色，亦以其一地之長地位拔擢該地域社會的鄉紳階層子弟，大田清一更是幫助劉福才繼續補習、升學的重要節點人物。其次，從劉福才求學階段伊始，自 1911 年剛從臺北國語學校畢業進入新社公學校服務的年輕老師，並在 1948 年起擔任鄉長的陳正義，於其北上求學期間，只要暑假返鄉，就會前往探訪，兩人的關係亦師亦友，也

是少數橫跨劉福才早期和晚期網絡的人物，是為貫穿劉福才一生之社會網絡，並影響其至深之重要人物。再者，第二個主要次群體網絡則為以楊順財、黃權等人為主之新社農校時期網絡。其中楊順財亦為橫跨新社公學校同學迄新社農校時期之網絡中心人物，其與過去師生、同學網絡的聯繫，說明了不同時期間網絡成員的延續與多重關係，也意味著教育圈網絡的構成與網絡成員，不僅造就了劉福才的地方菁英身份，也同時影響了劉福才一生社交圈圖像的輪廓與轉變。

接著，相對於次群體較為分歧之教育圈網絡，「圖18」中的政治圈網絡相對顯得集中且聯繫更為密集。對照「圖21」觀察，發現該網絡規模較小，並且以時任督學及中國國民黨地方黨部主委的何金生較為重要，其為劉福才政治圈網絡與政府人員網絡之間之弱聯繫中介節點，串連了兩個網絡的資訊流通與傳遞，主要與劉福才於議員任期結束後，投入1953年的新社鄉鄉長選舉而仍與之互動頻繁有關。其次則為在劉福才參選議員初期即給予多方協助的田玉金。除此之外，由於此網絡未納入協助劉福才參選的劉家親屬與其親友，而僅就網絡成員之屬性擷取而來，可藉此檢視劉福才個人所關注的政治圈網絡主要中心人物，拼湊出該時期劉福才所接觸的政界人脈圖像。除此之外，該網絡圖更涵蓋了政府人員社會網絡，然而部分結構零散並無整體性，可見政府人員在該網絡中無其他相關聯繫，係為其他時空背景下之關係所產生之聯繫網絡。[59]

[59] 劉福才於日治時期並未參與過政治活動，初步透過日記發現，其小時候曾親身經歷過馬力埔事件，但因當時年幼，事件細節亦為由鄉里、家人方面聽說而來。此外，其關注政治事件的形式與媒介係為透過報章雜誌、廣播等，並僅在日記中描寫時事。然而，劉福才雖曾在新社庄役場時期擔任政府職員，但因為日記材料短缺所囿而無法形成同事網絡，故日治時期所接觸過的政府人員係基於教育圈上的工作來往，而無法形成政治圈網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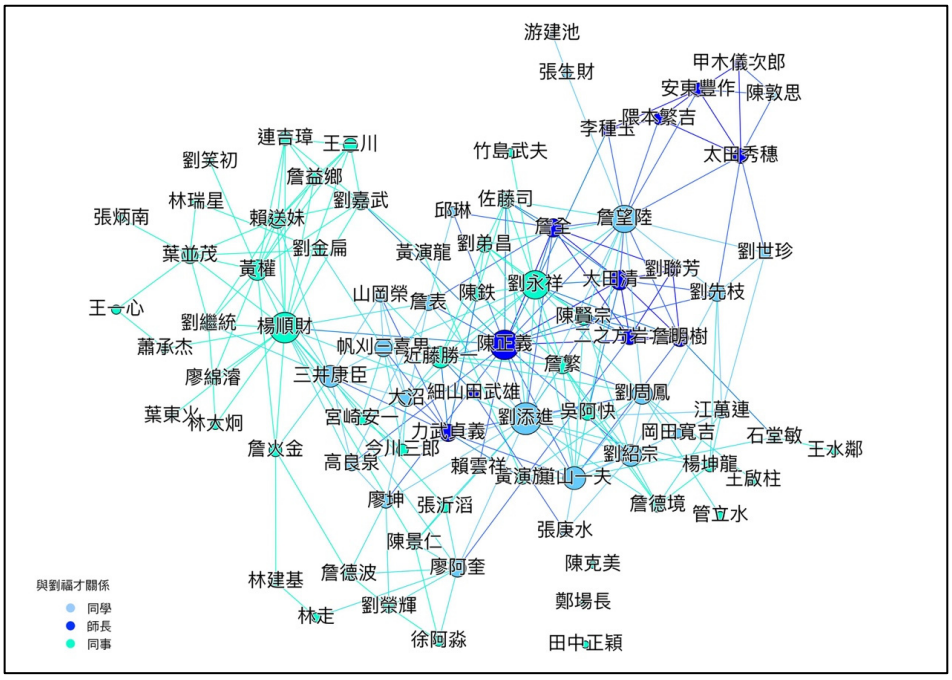

圖 20　《劉福才日記》中的同學、師長及同事網絡圖（1917-1977）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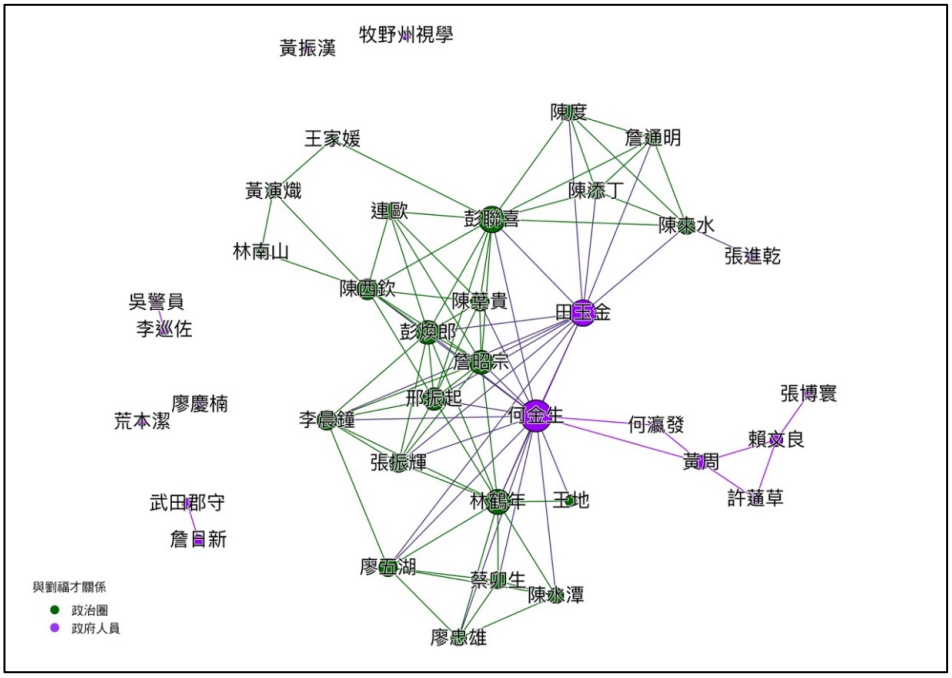

圖 21　《劉福才日記》中的政治圈政府官員網絡圖（1917-1977）

六、結論

本文屬於解題式的研究討論，主要藉由社會網絡分析軟體，試圖以視覺化的方式，呈現傳統文本中不易被掌握、觀看的社會網絡。據此，本文發現《劉福才日記》雖然記錄的時間長達 60 年，然而藉由日記之事蹟所形成之生命軌跡，以及基於分析《劉福才日記》所記錄之行動者形成之社會關係，可對照劉福才從事的活動與職場，將其一生細分為 13 個時期。總體而言，本文透過各項網絡指標，以視覺化分析劉福才在日記中所載及其一生在不同單位與職位的社會關係網絡，發現劉福才每個階段所關注之網絡主體，由於人生經歷與工作職場與際遇等緣故，呈現出地方社會菁英在不同階段的社會關係網絡之面貌與變化。首先，基本上早期與晚期的記載焦點都以親人為多，然而並非完全是同一群人，畢竟家族長輩們會隨著歲月的流逝而相繼去世；另一方面，家族的子孫接續地出生、結婚和生子，家族成員也因此不斷增加，網絡組成亦隨之改變。其次，劉福才青年時期專注於職場與教學，而與同事、學生與地方政府人員之間的聯繫擴大了此時期之社會網絡規模，因此造成網絡組成的多樣化與網絡結構的複雜程度，同時拓展了劉福才往後各方面的人脈網絡。然而，第一次離開教職時，則是劉福才一生中首次的轉折點。觀察網絡圖，其離開教職後所關注的事件與人物遂無法聚焦，且網路結構亦顯得非常零碎。此狀況提示了劉福才在受到時代與環境變化的影響下，其日記文本不再書寫公領域煩心瑣碎之事，因而未能觀察到劉福才離開教職後社會網絡之規模，文本中心也轉為以親屬為主之關係網絡。此謂以日記為文本進行社會關係網絡分析，無法詳盡解釋之盲點。至於春秋鼎盛的中壯年時期，由於參與政治活動及擔任農校校長一職的緣故，此階段的記錄重心除以工作或與同事之間事件為主外，更擴展到臺中地方政治圈的人物與事件，使該時期網絡結構又再度變得高度集中，以往擔任教職時期所累積之人脈影響甚深，展現出該時期網絡之巨大轉變。而後劉福才步入晚年，在歷經無職與重返教職的人生過程中，記述內容又復歸

親屬網絡的重心。

質言之，藉由社會網絡分析的各個面向與指標，梳理《劉福才日記》所蘊含其一生中不同階段之社會網絡結構、規模與特徵，我們得以藉此猜測劉福才如何以地方菁英的地位，運用自身的資源與人際網絡推動地方發展。同時，闡明地方型菁英在歷經日治時期過渡到戰後的過程中，由於身處的環境與背景呈現出何等之社會網絡變貌、社交圈，甚至影響其人生際遇，而串聯起同時代中代表不同領域之地域性菁英的社會網絡圖像。

總體而言，本文除了解題式地介紹新公開的《劉福才日記》外，也首次嘗試將《劉福才日記》中的行動者、事件、地點進行編碼，建構出文本中的人物關係網絡。藉由社會關係網絡的視覺化，本文呈現出在地方菁英劉福才的眼中，哪些人處於整體網絡的核心，是能夠協調和擴散訊息的主要人物？而在地方社會的政治、經濟、文教、信仰等場域中，誰又是核心人物？等等介於各方面之網路中心人物、中介人物，甚至是藉以建置新社地方的社會菁英網絡。此外，在日記所涵蓋的1910年代到1970年代之間，這些位居核心的人物地位是否出現改變？質言之，回答這些問題有兩個更深層的意義。首先，這些觀察有助於細緻地檢視作為新社地區的居民如何從傳統的血緣化、原鄉化社會，轉化成認同一定空間範圍的地緣社會，並且在「新社庄」的空間範圍內，如何透過各種交互重疊的政治、經濟、文教、信仰等場域中和社會成員互動的過程，由外而內、由上而下地形塑出具有一體感的空間認同。也就是施添福於民雄的研究經驗所指出，由「街庄民空間」逐漸融合「警察官空間」及「部落民空間」的空間認知過程，[60]這個部分也是未來日記研究者應用地理資訊系統及社會網絡分析工具時，可以進一步發展的研究方向之一。不可否認的，儘管《劉福才日記》的主人公劉福才只是日治時期新社地區地方型歷史人物，然而本文的企圖其實更在於提示一個如何利用地理資

[60] 施添福，〈日治時代臺灣地域社會的空間結構及其發展機制——以民雄地方爲例〉，頁1-39。

訊系統和社會網絡分析軟體等工具建置日記資料庫，並據此展開個人生命史研究之方法取徑，期待日後研究者可藉由本研究的方法和經驗，進一步針對同時期的臺灣中部，甚至是全臺性人物所書寫的日記文本，如張麗俊（1868-1941）的《水竹居主人日記》及林獻堂（1881-1956）的《灌園先生日記》等，展開多文本的比對、分析和研究，應能將日記之於臺灣史研究的領域，拓展至更為開闊的視野。[61]

（責任編輯：王亭方　校對：江昱緯）

[61] 舉例來說，張麗俊曾於日記中提及劉福才曾前往豐原拜會他，請求為其指導漢文。後來張麗俊贈詩給劉福才，但張麗俊的日記中並未記載詩的內容；不過，同樣在日記中記載此事的劉福才則在日記中則完整記錄了該首詩作。換句話說，未來若能以多文本的方式進行比對、分析，應能發現更多遺漏的片段以及具有意義的連結。劉福才，《劉福才日記》，第1冊（1917-1977），檔案號：T1091_001-0150；張麗俊著，許雪姬、洪秋芬、李毓嵐編纂，解讀，《水竹居主人日記（8）：1929年至1932年》（臺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2004），頁255-257。

引用書目

一、文獻史料

〈教育研究物當選者〉，《臺灣總督府報》，臺北：國史館臺灣文獻館，1931，典藏號：0071031172a005，2月11日，第1172。

「臺中縣立新社初級農業職業學校校長劉福才委充案」，〈臺中職業學校校長任免〉，《臺灣省行政長官公署檔案》，南投：國史館臺灣文獻館藏，典藏號：00303233054001，1946年12月26日。

張麗俊著，許雪姬、洪秋芬、李毓嵐編纂・解讀，《水竹居主人日記（8）：1929年至1932年》，臺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2004。

新社鄉誌編輯委員會編，《新社鄉誌》，臺中：大社會文化事業出版社，1998。

臺灣總督府編，《臺灣總督府及所屬官署職員錄・昭和九年》，臺北：臺灣時報發行所，1934。

臺灣總督府編，《臺灣總督府及所屬官署職員錄・昭和四年》，臺北：臺灣時報發行所，1929。

臺灣總督府編，《臺灣總督府職員錄》，臺北：臺灣日日新報社，1929-1934、1941。

劉福才，《劉福才日記》，臺北：中央研究院臺灣史研究所檔案館藏，第1-5冊（1917-1977），檔案號：T1091_001 至 T1091_005。

鄭瑞明、溫振華、戴寶村、施志汶、陳國川、廖振富、黃繁光、蔡錦堂，《新修霧峰鄉志》，臺中：霧峰鄉公所，2009。

二、近人專書

李宗信撰，鍾依萍、張倚瓏、郭宏遠編，《細說苗圃：大南庄蔗苗養成所的故事》，臺中：行政院農業委員會種苗改良繁殖場，2018。

宮崎聖子，《殖民地臺灣之青年團與地域變貌》，臺北：臺大出版中心，2019。

張鎮華，《演算法觀點的圖論》，臺北：臺大出版中心，2017。

許佩賢，《帝國的學校・地域的學校》，臺北：臺大出版中心，2020。

陳文松，《殖民統治與「青年」：臺灣總督府的「青年」教化政策》，臺

北：臺大出版中心，2015。

Coleman, James. *Foundations of Social Theory*. Cambridge: Belknap Press, 1990.

Wasserman, Stanley and Katherine Faust. *Social Network Analysis: Methods and Applications*. 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4.

三、近人論文

王政文，〈臺灣基督徒史資料庫與社會網絡研究〉，《臺灣學通訊》，104，新北，2018.3，頁22-23。

王業立、蔡春木，〈從對立到共治：臺中縣地方派系之轉變〉，《政治科學論叢》，21，臺北，2004.9，頁189-216。

王靜儀，〈臺中縣地方派系之形成背景與組織結構（1951～1987）〉，《臺灣文獻季刊》，54：3，南投，1993.9，頁309-339。

吳佩樺，〈「日記中的蔣介石」兩岸學術研討會紀要〉，《國史研究通訊》，8，臺北，2015.6，頁80-85。

施添福，〈日治時代臺灣地域社會的空間結構及其發展機制——以民雄地方爲例〉，《臺灣史研究》，8：1，臺北，2001.10，頁1-39。

翁稷安，〈《陳克文日記》中的人際關係及派系網絡——以 1937-1938 年為對象的討論〉，「第三屆『百變民國：1930 年代之中國』青年學者論壇」會議論文，臺北：國立政治大學歷史學系、中國社會科學院近代史研究所民國史研究室、近代中國與東亞研究群，2018 年 3 月 2-3 日。

張素玢、李宗翰、李毓嵐、李昭容、顧雅文、柯皓仁、謝順宏，〈從 CBDB 到 TBDB：以《新修彰化縣志・人物志》為試金石〉，《數位典藏與數位人文》，2，臺北，2018.10，頁91-115。

許雪姬，〈「臺灣日記研究」的回顧與展望〉，《臺灣史研究》，22：1，臺北，2015.3，頁153-184。

許雅惠，〈北宋晚期金石收藏的社會網絡分析〉，《新史學》，29：4，臺北，2018.12，頁71-124。

陳百齡，〈從歷史人物到地方社會網絡：皇恩碑史料蒐集與呈現〉，《竹塹文獻》，44，新竹，2009.2，頁 8-32。

曾士榮，〈一九二〇年代臺灣國族意識的形成：以《陳旺成日記》為中心的討論（1912～1930）〉，《臺灣文學學報》，13，臺北，2008.12，頁1-63。

萬毓澤，〈跨領域研究視野下的社會理論工作：分析社會學的觀點〉，《社會分析》，16，臺北，2018.2，頁105-174。

葉高華，〈分而治之：1931-1945 年布農族與泛泰雅族群的社會網絡與集團移住〉，《臺灣史研究》，23：4，臺北，2016.12，頁123-172。

葉高華，〈從山地到山腳：排灣族與魯凱族的社會網絡與集體遷村〉，《臺灣史研究》，24：1，臺北，2017.3，頁125-170。

蔡旻遠，〈「個體」與「群體」：近代中國知識分子之研究回顧與展望〉，《史原》，31，復刊10，臺北，2019.9，頁257-299。

Barnes, J. A. “Class and Committees in a Norwegian Island Parish.” *Human Relations*, 7: 1 (February, 1954), pp. 39-58.

Diesner, Jana and Kathleen M. Carley. “Revealing Social Structure from Texts: Meta-Matrix Text Analysis as a Novel Method for Network Text Analysis.” In *Causal Mapping for Research in Information Technology*, edited by V. K. Nakayama and Deborah J. Armstrong, pp. 81-108. Hershey PA: Idea Group Pub., 2005.

Erikson, Emily and Peter Bearman. “Malfeasance and the Foundations for Global Trade: The Structure of English Trade in the East Indies, 1601-1833.” *American Journal of Sociology*, 112: 1 (July, 2006), pp. 195-230.

Freeman, Linton C. “Visualizing Social Networks.” *Journal of Social Structure*, 1, (February, 2000), pp. 1-15.

Granovetter, Mark. “Economic Action and Social Structure: The Problem of Embeddedness.” *American Journal of Sociology*, 91: 3 (November, 1985), pp. 481-510.

Granovetter, Mark. “The Strength of Weak Ties.” *American Journal of Sociology*, 78: 6 (May, 1973), pp. 1360-1380.

Marsden, Peter V. “Network Data and Measurement.” *Annual Review of Sociology*, 16 (August, 1990), pp. 435-463.

McGrath, Cathleen, Jim Blythe and David Krackhardt. “The effect of spatial arrangement on judgments and errors in interpreting graphs.” *Social Networks,* 19: 3 (August, 1997), pp. 223-242.

Minakowski, Marek Jerzy. “Family Network of Emerging Jewish Intelligentsia (Cracow 1850-1918).” *Journal of Historical Network Research*, 2: 1 (December, 2018), pp. 53-75.

Padgett, John F. and Christopher K. Ansell. “Robust Action and the Rise of the Medici, 1400-1434.” *American Journal of Sociology,* 98:6 (May, 1993), pp. 1259-1319.

Tilly, Charles. “Retrieving European Lives.” In *Reliving the Past: The Worlds of Social History*, edited by Olivier Zunz, pp. 11-52. Chapel Hill: University of North Carolina Press, 1985.

Wetherell, Charles. “Historical Social Network Analysis.” *International Review of Social History*, 43: S6 (December, 1998), pp. 125-144.

四、其他

不著撰人，《臺中縣議會第一屆第一次定期大會》，臺北：臺灣省參議會，1951。取自中華民國國家發展委員會建置，「臺灣議事資料開放平臺」。〈http://doi.org/10.6731/TCCC_proceedings.007c-001-R1-01524900〉（2020/3/10）。

中央研究院臺灣史研究所，「臺灣日記知識庫」。〈http://taco.ith.sinica.edu.tw/tdk〉（2019/2/18）。

中央研究院臺灣史研究所，「臺灣總督府職員錄系統」〈http://who.ith.sinica.edu.tw/s2g.action〉（2020/3/14）。

Harvard University, Academia Sinica and Peking University, 2018. China Biographical Database. https://projects.iq.harvard.edu/cbdb (2020/3/14).

Social Networks and The Diary of Liu Fucai: Applying Geographic Information Systems and Social Network Analysis Software

Li, Chung-hsin* Chang, Yu-cheng** Liu, Ting-yu***

Abstract

This paper introduces the reader to the *Diary of Liu Fucai*, which contains the diary entries of Liu Fucai written between 1917 and 1977, the year of his death. Liu was one of the few intellectuals from the Danan region of central Taiwan during the Japanese colonial rule period (1895-1945); for many years, he was the principal of Xinshe Agricultural Senior High School (since renamed Xinshe High School); and he also traveled extensively throughout Taiwan during his long and active life. His diary is thus an invaluable historical source document for central Taiwan, all the more so because Liu was an able writer who painted many a vivid scene of the events he personally witnessed and experienced. In addition to providing an introduction to Liu's diary, this paper also examines the social networks mentioned by Liu, using a database constructed with geographic information systems and social network analysis software. In this way, we have created a scaled-down version of the geography and historical developments of the Danan and Xinshe regions during the early twentieth century. It is hoped that the present paper can serve as an example for the application and use of geographic information systems and social network analysis software.

Keywords: *Diary of Liu Fucai*, historical social network analysis, historical geographic information system, Xinshe

* Associate Professor and Director, Graduate Institute of History, National Changhua University of Education

** Master, Department of Sociology, National Taiwan University

*** Master, Department of Geography, National Changhua University of Education